

目录

一. 《沉香屑·第一炉香》主要内容和创作背景	2
(一) 主要内容	2
(二) 创作背景	3
二. 《沉香屑·第一炉香》主题思想	3
三. 《沉香屑·第一炉香》葛薇龙形象分析	3
四. 《沉香屑·第一炉香》梁太太形象分析	6
(一) 恶毒的美貌	6
(二) 不中不西的居住环境	7
(三) 流露传统观念的语言	8
(四) 与曹七巧一类的怨妇	9
五. 《沉香屑·第一炉香》心理描写分析	10
六. 《沉香屑·第一炉香》语言艺术	13
(一) 词义偏离	13
(二) 超常改装	14
(三) 超限组合	14
七. 《沉香屑·第一炉香》色彩词运用	14
(一) 色彩词的构成	14
(二)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色彩词分析	15
(三)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色彩词的运用	15
八. 《沉香屑·第一炉香》叙事策略分析	17
(一) 叙事视角: 全知叙事与限知叙事的杂糅	17
(二) 叙事时间: 时序和时距	18
九. 《沉香屑·第一炉香》的女性形象与悲剧底色	21
(一) 时代困境下出走的女性形象	21
(二) 时代困境下的悲剧底色	22
十.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主人公的身份焦虑	24
(一) 根深蒂固的种族观念	24
(二) 精神文化的割裂	25
十一. 《沉香屑·第一炉香》女性焦虑意识新解	26
(一) 女性焦虑意识在故事里的定位: 张力和魅力	26
(二) 女性焦虑意识在故事里的沉浸: 反复和回旋	27
(三) 女性焦虑意识在现代性场域中的表达: 反映和期待	28
十二. 《沉香屑·第一炉香》精神分析视域下的解读	30
(一) 初入社会: “本我”的躁动与“自我”的坚守	30
(二) 情欲追寻: “自我”的放纵与“超我”的克制	31
(三) 走向毁灭: “自我”的沉沦	32
十三. 《沉香屑·第一炉香》具有“悲”色彩的比喻句	33
(一) 具有“悲伤”色彩的比喻句: 营造阴凉黑暗的环境、表现人物悲伤的心境	33
(二) 具有“悲惨”色彩的比喻句: 烘托阴森恐怖的气氛、暗示人物悲惨的命运	34
(三) 具有“悲凉”色彩的比喻句: 渲染毁灭死亡的气息、传达人物悲凉的意识	35

十四.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看”与“被看”	35
(一) 东方与西方之间的“看”与“被看”	36
(二)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看”与“被看”	36
(三) 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看”与“被看”	37
十五. 《沉香屑·第一炉香》题目意义解读	38
(一) 关于“沉香屑”	38
(二) 香炉的意义	38
(三) 烧香及其作用	39
十六. 《沉香屑·第一炉香》的苍凉之感	41
十七. 意象分析	42
(一) 风雨意象	42
(二) 服饰意象	43
(三) 仙人掌-蛇意象	43
(四) 金刚钻手镯-手铐意象	43
(五) 黑夜意象-寒冷、黑暗	43
(六) 蜘蛛意象	44
(七) 红花意象	44
(八) 月亮意象	44
(九) 沉香屑	44

一. 《沉香屑·第一炉香》主要内容和创作背景

(一) 主要内容

《沉香屑·第一炉香》是作家张爱玲创作的中篇小说，发表于杂志《紫罗兰》1943 年第二期至第四期，收入 1944 年 8 月上海杂志社《传奇》，中国大陆地区版本收录于小说集《倾城之恋》。

该小说讲述了从上海来到殖民地香港读书的少女葛薇龙如何一步一步堕落的故事。上海的女中学生葛薇龙跟随家人一起到香港避难。后因物价飞涨，家人打算离港返沪，薇龙为了继续求学，投靠了与亲戚断绝关系多年的，富有寡居的亲姑母。在姑母豪华、精巧的房子里，葛薇龙开始为姑母的物质款待所俘虏。三个月后，当初决心出淤泥而不染的薇龙在衣服与首饰的慢慢腐蚀下，对姑妈家的生活已经上了瘾。

等薇龙已经迷恋上这样奢华的生活后，姑妈梁太太便露出了真面目。她先是以薇龙为诱饵吸引青年才俊，以供自己之需，然后充当皮条客，企图把侄女推到老情人司徒协怀里。陷入困境的薇龙，继而为浪荡子乔琪乔的风仪震撼，迷恋而无法自拔。梁太太为了达到人财两全的目的，劝乔琪乔同葛薇龙结婚：可以先让薇龙以出卖肉体挣钱，等薇龙不能挣钱养家了，乔琪乔尽可以离婚。在姑母指导下，葛薇龙最终和乔琪乔结了婚，却堕入为梁太太弄人、为乔琪乔弄钱的交际花境地。

（二）创作背景

《沉香屑·第一炉香》故事的发生以香港为背景，香港对于张爱玲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939年至1942年，在香港大学读书的三年中，张爱玲虽然为了学业而停滞了自己的小说创作，但这并不代表张爱玲什么都没有做。相反的，她用三年的时间，来收集酝酿并沉淀自己的写作素材以及创作背景，创作出了“沉香屑”两部故事。

二.《沉香屑·第一炉香》主题思想

《沉香屑·第一炉香》是一个少女成长从而丧失天真的故事，是一个少女被诱惑而堕落的故事，显示了物欲、情欲对人的摧毁性力量，以及道德的脆弱性。小说中，梁太太和乔琪乔合力促成了薇龙的堕落。对于梁太太的意愿来说，薇龙的堕落没有磨损对乔琪乔的爱，她没有成为梁太太那样无爱的物质主义者。对于乔琪乔来说，因为薇龙的自我牺牲以及没有侵蚀的爱情，所以这个荡子面对她时仍然会有良心上的愧疚。更重要的是，薇龙对自己的境遇一直是有自省意识的，她纠缠在自省与自欺之间，这种内在矛盾到结尾简直成为肉中骨刺一般的痛苦。小说写出了薇龙的心路历程，但作者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在于，同时写出“自省”和“自欺”的争战。虽然自欺一时战胜自省，导致薇龙的堕落。但自省却并没有就此缺位，而是始终伴随薇龙左右，难以彻底堕落。

三.《沉香屑·第一炉香》葛薇龙形象分析

1943年，《沉香屑·第一炉香》发表在当时上海著名的鸳鸯蝴蝶派刊物《紫罗兰》上。作品发表以后，张爱玲一举成名，现收录于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中。小说描写了来自上海的纯真女生葛薇龙，在金钱的诱惑下心甘情愿地陷入姑妈梁太太和香港花花公子乔琪共同设下的情网，成为了香港洋场社会的奴隶。

作品一开始写上海女学生葛薇龙到香港求学，因家庭经济拮据不得不投靠她的姑妈梁太太。姑母年轻时凭着长相出众，嫁给香港富豪做了四姨太，葛家人认为其自甘下贱，有辱家门，于是和她断绝往来。现在姑妈是在上流社会的声色场里纵情欢乐的人物。老头子遗嘱上给她留下了一大笔遗产，她什么都不缺，整天就是应酬——办宴会、打牌、跳舞、打情骂俏，名声也不好。葛薇龙初见姑母，姑母对她的态度极其冷淡刻薄。“薇龙放胆上前，叫了一声姑妈，她姑妈梁太太把下巴腮儿一抬，眯着眼望了她一望。薇龙自己报名道：“姑妈，我是葛豫琨的女儿。”梁太太劈头便问道：“葛豫琨死了么？”薇龙道：“我爸爸托福还在。”梁太太道：“他知道你来找我么？”薇龙一时答不出话来。梁太太道：“你快请罢，给他知道了，又一场大闹呢！我这里不是你走动的地方，没准沾辱了你好名好姓的！”薇龙陪笑道：“不怪姑妈生气，我们到了香港这多时，也没有来给姑妈请安，实在是该死！”梁太太道：“哟！原来你今天是专程来请安的！我太多心了，我只当你们无事不登三宝殿，想必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当初说过这话：有一天葛豫琨寿终正寝，我乖乖的拿出钱来替他买棺材。他活着一天，

别想我借一个钱！”

虽然葛薇龙感到很屈辱，但是，为了能完成学业她还是将满腹委屈收起，低声下气向姑妈恳求帮助，最终葛薇龙住进梁家的豪宅。

葛薇龙第二次到姑妈家，被安排入住房间后，无意发现满柜的漂亮新衣。于是葛薇龙忍不住锁上了房门，偷偷的一件一件试着穿，更让她意外的是居然每一件都很合身。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葛薇龙开始想自己这一系列的经历，突然她明白，原来这都是姑妈特地为她置备的。“一个女学生哪里用得着这么多？薇龙在床上坐下了，脸上一阵一阵的发热，低声道：“这跟长三堂子里买进一个人，有什么分别？”梁太太虽然没有讲明，但是葛薇龙很清楚地意识到自己需要充当什么角色了：姑妈想把她当作一个钓饵，用她来吸引男人。

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葛薇龙还是选择留下，留下就要付出相应的代价。葛薇龙以为，可以走一步看一步。她以为，自己能够保持清白：“只要我行得正，立得正，不怕她不以礼相待。外头人说闲话，尽他们说去，我念我的书。将来遇到真正喜欢我的人，自然会明白的，决不会相信那些无聊的流言。”应该说作为一个涉世不深的女学生她把这个世界想的太简单了。

之后在姑妈的安排下葛薇龙开始参加各种酒会、聚会、文艺沙龙、周末派对，渐渐小有名气，而且葛薇龙越来越被上流社会的豪华、奢侈的生活所吸引，无力自拔。“三个月的工夫，她对于这里的生活已经上了瘾了。她要离开这儿，只能找一个阔人，嫁了他。一个有钱的，同时又合意的丈夫，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她的人生理想和爱情信念完全改变了：由最初的想完成学业找个中意的人到现在的想嫁人最好是合意的有钱人。葛薇龙曾是一个努力追求爱，追求幸福，渴望自食其力的平凡女孩，但最单纯的追求与向往被酒色财气淹没在灯红酒绿中。

其实葛薇龙是很排斥物质化爱情的，如姑妈梁太太那样，等于卖了自己嫁个有钱人，她不想做姑妈那样的物质主义者。因此在梁宅面对富商司徒协图谋不轨、金钱引诱的时候葛薇龙极力地拒绝，这可以看作是一个纯洁女孩对物质化爱情的抵抗。她虽然可以拒绝司徒协，却无法拒绝乔琪所谓的爱情。

乔琪是社交界知名的花花公子，父亲是巨商，养了 20 个老婆。但是乔琪本人没钱，因为他母亲失宠，父亲也不喜欢他。他风流倜傥，潇洒幽默，和葛薇龙这个交际场上稚嫩的后起之秀相比，乔琪的调情手段高出不止一个层次。葛薇龙虽然知道乔琪是怎样一个人，除了吃喝玩乐之外，他什么本事都没有，还经常拈花惹草，但是仍然爱上了他。“薇龙那天穿着一件磁青薄绸旗袍，给他那双绿眼睛一看，她觉得她的手臂像热腾腾的牛奶似的，从青色的壶里倒了出来，管都管不住，整个的自己全泼出来了。”也许是因为从没有人像乔琪这样对她如此温柔体贴，也许是因为乔琪是她所知道的唯一能够抗拒梁太太的人，也许是因为她很需要一个依赖来排解被姑妈束缚的苦闷，又也许是因为乔琪有时对她的若即若离，勾起了一个女人征服男人的欲望，这就是爱，说也说不清楚。

葛薇龙对乔琪爱的死心塌地，对这种爱情怀有纯洁的梦想。她自信地以为依靠自己爱情的力量，可以使乔琪浪子回头，她甚至计划着自己出去赚钱和乔琪结婚，她想在这种纸醉金迷是世界中，能拥有一个美好而浪漫的爱情田园。经过一段相处，葛薇龙和乔琪说到结婚。但是乔琪却拒绝结婚，他说：“我不能答应你结婚，我也不能答应爱你，只能答应你快乐。”

作品中这样写道：“这和葛薇龙原来的期望相差太远了，她仿佛一连向后猛跌了十丈远，人有些晕。”乔琪带上墨镜，“葛薇龙抓住他的外衣的翻领，抬着头，哀恳似地注视着他的脸。她竭力地在他的墨眼镜里寻找他的眼睛，可是她只看见眼镜里反映的她自己的影子，缩小的，而且惨白的。她呆瞪瞪的看了半晌，突然垂下了头。”她身体颤抖，说：“我……我怕的是我自己！我大约是疯了！”然后，就大哭起来。说：“我可不是疯了！你对我说这些无礼的话，我为什么听着？”葛薇龙的痛苦在于她爱情希望的破灭。

葛薇龙对乔琪的“爱情”，实际上更像是一种无法掌控的欲望。爱情应该是有理性的，它源于情欲而又高于情欲。而欲望恰恰相反，它是不可理喻的、非理性的。葛薇龙明知道乔琪无才无德，也没有丰厚的经济实力，对自己也只是玩玩罢了，但在情欲的驱动下，薇龙还是心甘情愿做了乔琪的情人。可就在成为乔琪情人的同时，薇龙又无意中发现乔琪与姑母的丫环私通，于是她忍无可忍，想到了逃回上海，可是由于下雨、生病，耽搁了行程。她病倒了，留下还是回去，她犹豫着。葛薇龙怀疑生这场病“也许一半是自愿的，也许她下意识地不肯回去，有心挨延着。”回到上海会过什么样的生活呢？“念了书，到社会上去做事，不见得有她这样的美而没有特殊技能的女孩子的适当的出路。”辛苦赚钱努力工作也不过能满足温饱。而此时梁太太的适时出现，耐心开导也让葛薇龙很纠结：“你来的时候是一个人。你现在又是一个人。你变了，你的家也得跟着变。要想回到原来的环境里，只怕回不去了。”而当她从她姑母那里得知乔琪不是没能力娶她，只是不甘心娶她这样没钱的人做妻子时，薇龙不假思索地对姑母说：“我没有钱。但是……我可以赚钱。”进而又辩道：“怎么不见得我不能赚钱？我并没有向司徒协开口什么，他就给了我那只手镯。”至此，葛薇龙决定要将自己的色相作为挣钱的资本了。这是小说关键性之处，薇龙为了长久地得到乔琪所谓的爱，为了能继续过这种舒服自在的奢侈生活，向姑母妥协，做了梁宅的高级交际花。从此之后，薇龙这个人就等于卖给了梁太太与乔琪，整天忙着，不是替乔琪弄钱，就是替梁太太弄人。

文章最后选择让乔琪陪葛薇龙过年 30，在喧闹中配上乔琪的调情，制造出虚假的温暖。当葛薇龙被英国水兵误认为路边妓女后，葛薇龙道：“本来吗，我跟她们有什么分别？”在乔琪阻止中，薇龙笑着告饶道：“好了好了！我承认我说错了话。怎么没有分别呢？她们是不得已，我是自愿的！”冷淡的语调，不敢带上怒气，因为这本就是现实。

葛薇龙由一个单纯、自信、希望保持自己完整人格的少女到幻想的贬值，自信的破灭，终致人格的丧失，不管她如何挣扎，终究是别人棋盘中的一枚棋子。纯洁的青年就这样自甘堕落，最终为污浊的环境所吞没，陷入那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生活中。

在作品中，张爱玲把探寻女性不幸的目光转到自身，从女性本体出发，从人性堕落的角度挖掘女性不幸的根源。葛薇龙的这种卑微和鄙俗的悲剧婚姻和生存方式一方面是资本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在沪港两地媾合的产物，但作者更着意揭露的是她们作为人的意识的迷失和女性意志的滑落。

造成葛薇龙的悲剧原因有多方面的：姑母阴险、冷酷、狡诈，给她设圈套，逼良为娼。遇人不淑：本想投靠姑母，不料姑母把薇龙当成满足自己私欲的一个工具；本想找一个可以寄托终生的男子，却碰上了乔琪这样浮华放浪的花花公子。天不作美：葛薇龙曾一度想离开魔窟一般的姑母的寓所，不巧天降大雨，自己又生了病，耽搁了行程。以上是造成葛薇龙悲剧的客观原因，也是她悲剧的次要原因，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她自身人性上的弱点，主要体

现在她对物欲、情欲的痴迷上。姑母逼良为娼的陷阱从一开始就已明确摆在葛薇龙面前，是葛薇龙自己清醒地一步步身陷其中无法自拔，可以说物欲是走向人生深渊的动力；对一个热衷声色犬马的花花公子，葛薇龙从一开始就知道，但葛薇龙却愿意牺牲自己来供养他，爱到迷失了自我，她为自己选择了绝路。

其实张爱玲并不赞赏拒接物欲的爱情，并承认对“华服美食”的追求是人的本性，但张爱玲也认识到人往往会因此付出惨重的代价，甚至走到自己目标的对立面，回首一望，满目苍凉。

在张爱玲看来，葛薇龙只是一个普通人，正如作品开篇所说：“葛薇龙，一个极普通的上海女孩子。”她有普通人的七情六欲，她不过按照世俗的要求，按照自己的常识处世行事。正因为葛薇龙是普通人，所以才更具有代表性，她身上的弱点，是人类共同的弱点，发生在她身上的悲剧，也可能发生在其他人身上。张爱玲以非理性的情欲和物欲来解释了葛薇龙这个上海小女子的悲剧，道出了人与人之间在物欲、情欲、性欲的倾轧下，人性变得恐怖不堪，令人不寒而栗的肮脏、复杂、不可理喻的现实。《沉香屑·第一炉香》留给人们的思考是无限的，读者由葛薇龙的弱点及不幸来联系自己、反思自己，是这部作品非凡之处。

四.《沉香屑·第一炉香》梁太太形象分析

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人们主要将目光投射在主人公葛薇龙身上，然而小说的另一个主要人物——梁太太是非常具有典型意义的，像她这样性格病态的贵妇常常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出现。梁太太为了金钱牺牲青春和情欲，嫁给一个有钱的老头子，守寡后又疯狂地弥补自己失去的情欲，是一个曹七巧式的人物。她推动着故事情节的深入发展，葛薇龙在她恶意的教唆下一步步堕落成和她一样的人，和她共同埋葬在山顶的那座“皇陵”中。

（一）恶毒的美貌

张爱玲曾说：“对于不会说话的人，衣服是一种语言，随身带着的袖珍戏剧。”“个人住在个人的衣服里”。我们可以通过张爱玲对梁太太的外貌和服饰描写分析这一人物：“一个娇小个子的西装少妇跨出车来，一身黑，黑草帽檐上垂下绿色的面网，面网上扣着一个指甲大小的绿宝石蜘蛛，在日光中闪闪烁烁，正爬在她腮帮子上，一亮一暗，亮的时候像一颗欲坠未坠的泪珠，暗的时候便像一粒青痣。那面网足有两三码长，像围巾似的兜在肩上，飘飘拂拂。”

梁太太作为一个交际花，她与乔琪乔约会的打扮既不鲜艳又不暴露，相反她穿了一身黑，而且用面网将自己遮了个严严实实。梁太太因拜金而嫁给富商做姨太太，为他守寡穿黑色是不太可能的，有可能的是梁太太即使热爱交际，也如“装在套子里的人”一样，想把自己给封闭起来，隔离起来，以获得一些安全感。而初尝爱情的葛薇龙就不会这样打扮，她穿的是“姜汁黄朵云绉的旗袍”、“瓷青薄绸旗袍”、“白裤子，赤铜色的衬衫，洒着锈绿圆点子，一色的包头”，对比可见在风月场上久混的梁太太未必将乔琪乔的爱情看得重要不可，乔琪乔只是她众多情人中的一个，她的内心更坚硬冰冷，而薇龙对乔琪乔确实一往情深。这就说明为何梁太太可以联合乔琪乔算计葛薇龙，愿意让乔琪乔和薇龙结婚，而薇龙为了乔琪乔的爱情奋不顾身地将自己卖给了他俩。梁太太一身黑衣，面网点缀着蜘蛛，让人忍不住联想起剧毒的“黑寡妇”蜘蛛，推测她是一个阴险毒辣之人。那绿宝石蜘蛛又像泪珠，又像青痣，隐含着梁太太的辛酸——一个流落风尘、孤苦无依的老女人，作者对她也是有些许同情的。

在面部特写中，梁太太的脸更是形同僵尸。“白腻中略透青苍，嘴唇上一抹紫黑色的胭脂，是这一季巴黎新拟的‘桑子红’。薇龙却认识那一双似睡非睡的眼睛”。紫黑色的口红就像鲜血刚凝，仿佛要吃人一般，显得恶毒刻薄。眼睛似睡非睡，流露出媚态，缺少生气和活力，全然是对生活的不屑和颓丧。她是一个留存于过去的旧人，是一个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人，是一个不会向往美好未来的人。作者还在细节上着力刻画了梁太太的指甲：“两只雪白的手，仿佛才上过拶子似的，夹破了指尖，血滴滴的。”“一面笑，一面把一只血滴滴的食指点了住薇龙。”手指血滴滴的梁太太仿佛是一个杀人的恶魔，把食指点了住薇龙时，就像将魔爪伸向薇龙，让人不禁感到惊心动魄、万分恐惧，纯洁的少女薇龙就在梁太太两面三刀的算计下一步步走进了堕落的深渊。

（二）不中不西的居住环境

一个人的居住环境可以反映一个人的性格。小说大多借葛薇龙的眼睛观察梁太太的住处。葛薇龙第一次去梁太太家，她对这个新环境的印象是最新鲜直观的：“姑母家里的花园不过是一个长方形的草坪，四周绕着矮矮的白石卅字栏杆，栏杆外就是一片荒山。这园子仿佛是乱山中凭空擎出的一只金漆托盘。”这个园子是突兀的，是孤立无援的，从园子的地理位置可以看出梁太太的居住环境是荒凉的，没有生气的，与周围格格不入的，也没有任何邻居，可以推断房主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孤僻的、寂寞的、脱离时代的人。正如葛薇龙所想：“她看她姑母是一个有本领的女人，一手挽住了时代的巨轮，在她自己的小天地里，留住了满清末年的淫逸空气，关起门来做小型慈禧太后。”梁太太的花园不够美丽芬芳。园子里只在草坪的一角栽了一棵小小的杜鹃花，墙内的春天只是虚应个景儿，然而墙外是“满山轰轰烈烈开着野杜鹃，那灼灼的红色，一路摧枯拉朽烧下山坡子去了”。园子内布置谨严，花床疏疏落落，刻板少有生气，而园外是截然相反的另一个世界，是充满勃勃生机的。在这样的对照反差下，借环境描写显示出住在园内的梁太太人生的春天已经消逝，留下的只有荒凉的心境，

她不像其他主妇那样对生活充满热情，积极打理装饰自己的家园，而园外的葛薇龙正是青春年少，如盛放的野杜鹃一般热烈，但是这里埋下一个伏笔——她最终走进了园子，成了一株花容惨淡的小杜鹃。

作者张爱玲说：“处处都是对照：各种不调和的地方背景，时代气氛，全是硬生生地给搀揉在一起，造成一种奇幻的境界。”这可做整篇文章环境描写的中心句。故事发生的大背景是在新旧交替的中西结合的殖民地香港，鱼龙混杂，封建思想残存，资本主义金钱至上的观念又腐蚀着人们的心灵，梁太太和葛薇龙就是时代异化下的产物，在各方力量的推动下随波逐流，渐渐地为追求欲望而堕落，燃尽自己的一炉香。

作者在描写梁太太的典型殖民地式的房子时连用三个表示转折的连词突出梁太太既中又西，不伦不类，审美鉴赏水平很低。“山腰里这座白房子是流线型的，几何图案式的构造，类似最摩登的电影院。然而屋顶上却盖了一层仿古的碧色琉璃瓦”。“屋子四周绕着宽绰的走廊，当地铺着红砖，支着巍峨的两三丈高一排白石圆柱，那却是美国南部早期建筑的遗风”。“里面是立体化的西式布置，但是也有几件雅俗共赏的中国摆设”。“可是这一点东方色彩的存在，显然是看在外国朋友们的面上”。梁太太的房子色彩鲜明，奢侈豪华，为了迎合她的“朋友”的喜好，布置得花花绿绿，兼有一些东方式的小摆设取悦他们，但是缺少房主梁太太的个性喜好，从侧面反映出梁太太看似潇洒的生活其实并不自主，是依附于他人存活的。

薇龙还看到“宝蓝瓷盘里一棵仙人掌，正是含苞待放，那苍绿的厚叶子，四下里探着头，像一窠青蛇，那枝头的一捻红，便像吐出的蛇信子”，暗喻梁太太是一个蛇蝎美人，正在暗地里计划着对薇龙下毒手。

我们可以从梁太太的私人空间——小书房的布置近距离地窥测她的内心，她虽然穿西装、吃西餐，处处是西式作风，然而她骨子里还是一位封建社会的女子。“一引把她引进一间小小的书房里，却是中国旧式布置，白粉墙，地下铺着石青漆布，金漆大案，大红绫子椅垫，一色大红绫子窗帘”。第一，梁太太的房间布置得十分豪华，可以看出梁太太对于金钱和奢侈生活的极力追求；第二，房间配色浓重深沉，带有几分凄艳，令人感到压抑逼仄，可见梁太太内心的阴暗；第三，大红大绿对比鲜明，显示梁太太内心的躁动，尤其是大面积运用的大红色表明梁太太作为一个寡妇，并不是清心寡欲的，而是内心充满了汹涌的波涛，莫非她想做一个新娘子？

在葛薇龙的视角里“那巍巍的白房子，盖着绿色的琉璃瓦，很有点像古代的皇陵。薇龙觉得自己是《聊斋志异》里的书生，上山去探亲出来之后，转眼间那贵家宅第已经化成了一座大坟山”。梁太太家很有些鬼气，梁太太仿佛一个阴森的老妖魔，不仅自己葬送在这一个由金钱砌成的吃人不吐骨头的坟墓中，还圈禁控制了几位年轻女子为她“弄人”。梁太太是世俗社会中的受害者，将吸血吃人的传统延续下去，继续迫害一个又一个年轻的生命，让她们成为下一任吸血者。

在梁家举办宴会时的一段外景描写中：“梁家那白房子粘粘地溶化在白雾里，只看见绿玻璃窗里晃动着灯光，绿幽幽地，一方一方，像薄荷酒里的冰块。”“只有小铁门边点了一盏赤铜攒花的仿古宫灯。”既有富有西洋色彩的玻璃窗和薄荷酒，又有仿古宫灯，构成了一幅迷幻的诡异的畸形的场景，梁太太之流本是生长在封建社会里的人物，又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潮流的侵袭，终日陶醉于灯红酒绿和醉生梦死间不知今夕何夕，他们如鬼魅般生活在山间的迷雾里，看不见人生的方向和意义。他们效仿英国人举办园会，但只是东施效颦，装模作样。

“草地上遍植五尺来高福字大灯笼，黄昏时点上了火，影影绰绰的，正像好莱坞拍摄《清宫秘史》时不可少的道具。灯笼丛里又歪歪斜斜插了几把海滩上用的遮阳伞，洋气十足，未免有些不伦不类”。作者将此时的场景比作清宫，更显神秘，丫头老妈子也都拖着油松大辫，作红楼梦式的打扮。这些封建社会的遗老遗少们，还继续在香港这一殖民地继续做贵族梦，像消散不去的旧社会的阴魂。作者刻意创造了腐朽淫靡的环境，更显得梁太太之流的麻木愚昧。关于西方文明他们只学了个影子，模仿一些奢侈享乐的生活习惯罢了，但思想仍旧是传统的封建思想，谈不上半点民主和科学上的进步。

（三）流露传统观念的语言

梁太太是一个新旧交替时期的人，骨子里还是封建的，她思想的矛盾性体现在语言上。梁太太一见葛薇龙劈头便问道：“葛豫琨死了吗？”在痛骂哥哥中可见其对娘家的怨念极深。梁太太又极力想打发葛薇龙离开，说：“你快请罢，给他知道了，有一场大闹呢！我这里不是你走动的地方，倒玷辱了你好名好姓的！”可见梁太太对自己名声不好一事一直耿耿于怀，对娘家也心存芥蒂。梁太太是作风大胆泼辣的人，敢于为了追求富足的生活，不顾家庭阻拦一意孤行嫁给富商做姨太太，但是她并非是一个视封建传统道德规范为无物、勇于追求个人幸福的人，而是一个表面华丽光鲜，内心虚空的旧式女子，她所谓的女人的幸福只是靠畸形

的婚姻谋取金钱，她不具有进步性，是诸多生活痛苦的世俗市民中的一个代表，挣扎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之中，终究摆脱不了从小对传统道德理念耳濡目染，在别人如葛薇龙触及她的痛处时反应十分激烈。

她教训葛薇龙说：“等你到了我的岁数，你要有谈恋爱的机会，才怪呢！你看普通中等人家以下的女人，一过三四十岁，都变成了老太太。我若不是环境好，保养得当心，我早就老了。你呀——你这么不爱惜你的名誉，你把你的前途毁了，将来你不但嫁不到上等阶级的人，简直不知要弄到什么田地！”梁太太对自己嫁了个阔人这一点是得意洋洋的，她以青春和婚姻换取金钱，是张爱玲笔下诸多女性的共同点——没有谋生的能力，希望嫁个有钱人，依附丈夫过上好日子。她将自己的这个观点灌输给葛薇龙，将本来颇有些独立思想的葛薇龙调教成一个沉迷于声色犬马的花瓶。梁太太说：“一个女人，顶要紧的是名誉。我所谓的名誉和道学家所谓的名誉，又有些分别。现在脑筋新一些的人，倒不是那么讲究贞节了。小姐家在外面应酬应酬，总免不了有人说两句闲话。这一类的闲话，说得人越多，越热闹，你的名望只有更高，对于你的未来，并没有什么妨碍。”梁太太认为女性的贞节并不是十分重要，但是嫁得一个好人家的封建传统婚姻观念，又有西式的更开放的性观念，拿肉体用作谋求终身幸福的交易。

（四）与曹七巧一类的怨妇

梁太太与曹七巧是有相同之处的。她们同样为了钱而将自己的一生抵押给了畸形的婚姻，曹七巧嫁给了患骨痠的残疾人，梁太太嫁给年老的富商做姨太太，同样因为追求金钱而丧失了青春和爱情，正常的情欲得不到满足，过后又疯狂地追求情欲以弥补自己的缺失，最终性格变态扭曲，将自己遭受的迫害施加在后辈身上。曹七巧“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锁。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在自己被践踏被残害后又将自己的女儿、儿子劈杀。长白的妻妾都死了，长安的婚事也落了空，两兄妹最终都成了吸鸦片的浪荡子。梁太太出于变态的报复心理，一手将葛薇龙囚禁在自己的“皇陵”里，把原来一心向学的进步青年毁成欢场卖笑的高级妓女。金刚钻镯子与黄金枷锁有异曲同工之妙，“说时迟，那时快，司徒协已经探过手来给她戴上了同样的一只金刚石镯子，那过程的迅疾便和侦探出其不意地给犯人套上手铐一般”。黄金、钻石是枷锁，是手铐，一旦接受了，沾染上了，便不可自拔地陷入了金钱的地狱，永世不得超生。梁太太和曹七巧不仅自己被金钱囚禁，而且亲手打造了一副手铐，把自己的后人牢牢锁住。《金锁记》的结尾说：“七巧的女儿是不难解决她自己的问题的。”梁太太的侄女自然也学会了梁太太的手段和本领。

梁太太的悲剧是自己一手造成的，她自己踏进豪门的坟墓，而她的侄女也重复了她的求财之路，悲剧从踏进豪宅的那一刻开始。但她们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在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环境中，女子的自主权利很少，唯一的途径就是嫁人。“念了书，到社会上去做事，不见得是她这样美而没有特殊技能的女孩子的适当的出路。她自然还是结婚的好”。薇龙是接受过高中教育的，然而找到一份工作对她而言还是困难的，更不用提梁太太了。“在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里，女性只能作为男性的附属物而存在。男性世界的精神价值体系牢牢地掌控了女性的内心世界，让她们将一生的悲欢交由男性来导演，并不自觉地将自己矮化，多是从男性观照女性、视女性为性玩物的视角看待自我，将自我异化为用身体取悦男性的工具”。

由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传来的拜金主义之风吹得人心浮躁，一心想着追名逐利，不管是出身名门还是小门小户的女子在男权社会中都少有求生的机会，只能拼了命地将自己贱价出售，换取饱浸泪水的金钱，依附男性生存。她们缺少自力更生的能力，无法摆脱婚姻家庭的禁锢，因此只能忍气吞声，让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娜拉出走后该怎样？“娜拉出走之后的命运——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娜拉出走意味着女性摆脱男性束缚，走向社会，走向独立，而鲁迅对当时无法独立的女性命运斩钉截铁地预测：‘正是由于女性自身的不彻底性——她们反抗得不彻底，出走得不彻底，所以命运只能如此，只能充满悲剧色彩。’”张爱玲没有写激烈的起来反抗的英雄人物，她更多地展现被时代悄无声息吞噬的不知情的人性悲剧。《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金锁记》里的曹七巧、《第二炉香》里的蜜秋儿太太、《半生缘》里的顾太太等一系列家长形象，传统女性意识占了她们的大半个头脑，既是封建思想的受害者，又是害人者，作为女性，更加带有一股子阴气，将年轻的新生命一一掐死。

梁太太一类封建毒妇形象的塑造与张爱玲自身的经历有关。张爱玲生长于一个旧式封建大家庭，父母离婚，父亲和后母对她进行生理和心理上的虐待，曾因与后母发生口角而被父亲责打囚禁，父亲的遗少作风让她痛恨，张爱玲与母亲也有罅隙，作为一个接受新思想的女性，张爱玲对这种封建式的家长做派十分憎恶。之后爱情婚姻的不美满，社会舆论的压力，使得张爱玲对于真诚纯洁的爱情失去幻想，转而暴露了一出出与金钱交织的肮脏的情感交易，写下了一幕幕人财两空的悲剧。梁太太这个角色为张爱玲之后写曹七巧做了一次预告。

五.《沉香屑·第一炉香》心理描写分析

张爱玲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在某种意义上是一部心理小说，以女主人公葛薇龙的心理转变作为小说叙事的内在动力，将心理转变与情节发展有机结合在一起，贯穿故事始终。薇龙由一个漂亮、善良、纯洁的女孩蜕变为交际花，奔波于名利场，用金钱来锁住对乔琪莫名其妙的爱，甘愿成为贪婪自私的姑妈和浪子乔琪的工具。这样的转变发生在仅仅三个月的时间里，而且令读者信服。由此，可以见出这篇小说的艺术魅力和作家的艺术造诣。

小说的主要篇幅都在揭示葛薇龙的心理转变和性格变化过程。纵览整篇小说，我们发现，薇龙的内心挣扎共有6次。每次的挣扎过后，意味着她的妥协，直至彻底的屈服——清醒的堕落。

第一次：薇龙不顾上一辈的恩怨，到梁府寻求姑妈的资助，碰面后，尚未提出要求，被姑妈提起旧事，数落一番，薇龙受尽屈辱，伤心落泪。“心中暗想：姑妈在外面的名声原不很干净，我只道是造谣言的人有心糟蹋寡妇人家……如今看情形，竟是真的了！我平白来搅在浑水里，女孩子家，就是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我还得把计划全盘推翻，再行考虑一下，可是这么一来，今天受了这些气，竟有些不值得！”

第二次：蔻蔻提出要求，梁太太出于自己的考虑答应了，薇龙在回去的路上，心里在纠结着，还是说服了自己。“薇龙这么想着：‘至于我，我即睁着眼走进了这鬼气森森的世界，若是中了邪，我怪谁去？可是我们到底是姑侄，她被面子拘住了，只要我行得正，立得正，不怕她不以礼相待……决不会相信那些无聊的流言。’”

第三次：入住梁府的第一个晚上，薇龙打开壁橱，偷试衣服，发现竟是为自己量身定做的，感觉跟青楼的女子没有分别，但抵挡不住金翠辉煌衣服的诱惑，两次说道：“看看也好！”

第四次：眼见梁府丫头睇睇的遭遇，薇龙意识到自己就是睇睇的替身，帮梁太太弄人，

尽管现实肮脏、复杂、不可理喻，但薇龙看惯了，倒也毫不介意。

第五次：在园会上，薇龙喜欢的大学生卢兆麟被梁太太横刀夺爱，她还要帮梁太太应付乔琪，通过几次交往，她对乔琪萌生了好感，而这时，梁太太的旧欢司徒协送了一只手镯给她，薇龙感到这一举动有异，将有失身的危险。“唯一推却的方法是离开了这儿”，“薇龙叹了一口气：三个月的工夫，她对于这里的生活已经上了瘾了。”

第六次：薇龙寄希望于乔琪，抵挡不住对乔琪的喜爱和情欲的诱惑，委身于他，却发现乔琪在和她发生关系后，还与睨儿偷欢，薇龙狠打睨儿，大闹一场，决心高开香港回上海，刚好生了一场病，经过一番挣扎，薇龙决定留下，向姑妈讨教解决办法。“从此以后，薇龙这个人就等于卖了给梁太太与乔琪，整天忙着，不是替乔琪弄钱，就是替梁太太弄人。”

薇龙正是这样，一次次的挣扎，一次次的妥协，一步步走向那没有光的所在。她的心理转变就这样水到渠成，性格与命运也从此发生彻底改变。然而，还没有完，作家在小说结尾，描写了阴历三十夜游湾仔的一幕场景。薇龙在热闹中感到“无边的荒凉，无边的恐怖，当水兵把她误认为妓女时，薇龙说：“她们是不得已，我是自愿的！”——清醒的堕落！张爱玲透过葛薇龙因物欲和情欲的诱惑而自甘堕落的故事，揭示出“人性的普遍弱点”和人的生存困境，表达了对个体生命和人类的悲悯。

张爱玲学贯中西，大量运用心理描写，而且非常娴熟，取得了突出的艺术成就。

具体到《沉香屑·第一炉香》，作家自始至终都在描摹葛薇龙的心理活动和刻画她的性格变化，并且通过“显”和“隐”两种方式表现人物心理。

“显”的方式首先就是人物的内心独白，让人物直接“发声”，把内心的活动显露地展示出来。如薇龙第一次心理挣扎时，小说用了“心中暗想：姑妈在外面的名声原不很干净……我还得把计划全盘推翻，再行考虑一下，可是这么一来，今天受了这些气，竟有些不值得！”直接表现她的内心矛盾和决定。第二次用了“薇龙这么想着；至于我，我即睁着眼走进了这鬼气森森的世界，若是中了邪，我怪谁去……决不会相信那些无聊的流言。”第三次用了“低声道：这跟长三堂子里买进一个人，有什么分别”，“细声对楼下的一切说道”和“重新悄悄说道：看看也好！”的两次“看看也好”直接表明薇龙对诱惑没有加以抗拒，慢慢坠入堕落的深渊。

“显”的方式还表现在作家以全知全能的叙述人视角直接揭示人物的心理活动。既有人物一瞬间生发的心理感受，又有人物深思熟虑时的心理流——内心矛盾、纠结、挣扎直至做出决定这一完整的过程。如薇龙看到她家的佣人陈妈的辫子，不禁与梁太太家睨睨和睨儿的辫子比较，“薇龙忽然之间觉得自己并不认识她，从来没有用客观的眼光看过她一眼——原来自己家里做熟了的佣人是这样的上不得台盘！”¹⁷¹ 还未入梁府，薇龙已有意拿自家和梁府比较，心里潜在地对梁府有种向往，觉得自家的土气和不入流。这种微妙的心理变化为之后的彻底转变埋下了伏笔。

张爱玲擅长通过表现小说人物的心理流程，从而让人物的心理发展可触可感。如薇龙第四次心理挣扎时，“薇龙突然不愿意看下去了……那肮脏、复杂、不可理喻的现实”，“她暗自庆幸，梁太太只拿她当个幌子”，“这样的把戏，薇龙也看惯了，倒也毫不介意。”圆她对睨睨的遭遇深表同情，觉得现实肮脏，内心还保有做人的底线，也很清楚自身的角色定位，不过是梁太太弄人的工具，对此她也坦然接受。第五次，司徒协车上送薇龙手镯，她回梁府

后躺在床上”追想以前司徒协的深色，果然有异……他今天有这一举，显然是已经和梁太太谈妥了条件”，“无论如何，我得想法子还给他”，“一晃就是三个月，穿也穿了……如此看来，象今天的这类事，是不可避免的”，“唯一的推却的方法是离开了这儿”，“薇龙叹了一口气；三个月的工夫，她对于这里的生活已经上了瘾了。”这是一次至关紧要的心理挣扎，直接关系到人物的命运发展，从情节上讲是逼近小说高潮的重要一刻。

“隐”的方式即是通过意象和环境描写隐喻和暗示人物的内在心理的一种艺术表现手法，作家不直接表明人物的意识和心理活动，只是呈现意象和描写环境，人物的意识活动和心理感受被隐藏在意象和环境里。这需要读者进入到小说的情境中，设身处地地体验和体会，其中有一个艺术创造的过程。

张爱玲小说最大的艺术特色是广泛、大量使用意象。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也不例外，出现了许多的意象，揭示人物幽微、复杂的内心世界。

薇龙进到姑母家里，“一抬眼望见钢琴上面，宝蓝磁盘那一棵仙人掌，正是含苞欲放，那苍绿的厚叶子，四下里探着头，像一窠青蛇；那枝头的一捻红，便像吐出的蛇信子”，“不觉打了个寒噤”。蛇信子，暗示姑母家是吞噬健康生命的无底洞，一旦踏入，将深陷进去，无法自拔；把薇龙初进梁府时的害怕和忧虑的心理表现了出来。之后，她看到梁太太“把烟卷向一盆杜鹃花里一丢……烟卷儿窝在花瓣子里，一霎时就烧黄了一块”。毁掉红色的杜鹃花即是毁掉如花似玉的姑娘，睇睇的遭遇就是她的遭遇，薇龙的害怕和担忧心理更进了一层。此时，她看到窗外草坪上“有只麻雀，一步一步试探着用八字脚向前走，走了一截子，似乎被这愚笨的绿色大陆给弄糊涂了，又一步一步走了回来……也许那不是麻雀？”“麻雀”这一意象，把薇龙聊踢不前、矛盾犹豫的心理恰到好处地揭示出来。

当她受到乔琪的伤害，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还是决定离开香港，订了船票回家的时候，“竹子外面的海，海外面的天，都已经灰的灰、黄的黄，只有那丈来高的象牙红树，在暮色苍茫中，一路上高高下下开着碗口大的红花。”紧接着，当乔琪停下不再跟着她时，“整个的世界象一张灰色的圣诞卡片，一切都是影影绰绰的，真正存在的只有一朵一朵顶大的象牙红，简单、原始的、碗口大、桶口大。”向这里的象牙红花，极富象征意义，与灰色的荒凉世界相比，它象征着简单、原始、旺盛的生命力，是生生不息的生命之花。两次描写红花，实际上是借花反映蔻龙的心理状态，世界尽管荒凉、灰暗，但兴致冲冲地活着才是生命的真谛，把她内心的挣扎及其结果外化为蓬勃生长的象牙红，起到了含蓄蕴藉的艺术效果。所以，她已决定不走了，回到梁家后立刻向姑母讨教解决办法。

张爱玲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优良传统，在小说中大量运用环境描写。一种是通过自然景物的描写表现人物的心理和情感，从而达到“情景交融”的艺术效果；一种是用景物描写揭示人物的无意识，完整地刻画人物心理活动，实现意识和无意识、显意识和潜意识的互补与相得益彰。

梁太太答应了薇龙的要求，薇龙回去的路上，作家用了一大段的环境描写：“薇龙沿着路往山下走，太阳已经偏了西……那边，在山路的尽头，烟树迷离，青溶溶的，早有一撇月影儿。薇龙向东走，越走，那月亮越白，越晶亮……越走越觉得月亮就在前头树深处，走到了，月亮便没有了。”天上的月亮，象征着薇龙设想的前程，好像就在不远的前面，却原是水月镜中花。这一段景物描写把薇龙对未来生活的茫然、担忧和该不该到梁府寄住的犹豫

心理很好地刻画出来。王夫之说：“情景名为二，而是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情中景，景中情。”此处是极好的佐证。

精神分析的创始人弗洛伊德宣称：“心理过程主要是无意识的，至于意识的心理过程则仅仅是整个心灵的分离的部分和动作。”可见，无意识是心理生活中一块很大的领域，所指的是不能为意识所觉察或永远不能进入意识的心理部分。

司徒协在车上强送手镯给薇龙，薇龙回到房间后马上脱了下来，因为她知道手镯如同手铐，接受了便要突破她的做人底线，失身于司徒协。这时，小说中出现了一段环境描写：“紧对着她的阳台，就是一片突出的山崖，仿佛是那山岭伸出舌头舐着那阳台呢。在黄梅雨中，满山醉醺醺的树木，发出一蓬一蓬的青叶子味；芭蕉、梔子花、玉兰花……生长繁殖得太快了，都有点杀气腾腾，吹进来的风也有点微微的腥气。”“舌头舐”、“杀气腾腾”凸显了薇龙的无意识。“舌头舐”暗指司徒协对她的非分之想；“杀气腾腾”则是薇龙对这次送礼的感受——是对她人身清白的直接威胁，会突破她做人的底线，会让她坠入深渊、彻底堕落。这段景物描写完全就是在彰显她在这突如其来的紧要关头，紧张、焦灼、烦躁、恐惧等复杂心理。这些微妙莫测、头绪繁多的无意识，比较妥帖的方式就是用外在景物来表现。

张爱玲曾对胡兰成表白：“还没有过何种感觉或意态形致，把她所不能描写的，惟要存在心里一过，总可以说得明白。”她的自信是有道理的，她的心理描写的功力达到了中国现代作家中的一流水准。

六.《沉香屑·第一炉香》语言艺术

变异修辞，“是有意偏离语言某方面的规范而获得特殊的艺术效果的修辞活动”。即通过对固有语言规范的反叛，创造出变异的语言表达方式，以增强文学语言的审美效果。张爱玲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深得语言变异之精妙，字里行间时时闪耀出语言变异美的奇光异彩。本文主要探讨其在词义偏离、超常改装、超限组合这三个层面的语言艺术。

（一）词义偏离

张爱玲常借助特定语境或上下文的作用，积极地促使词语的正常含义在语流中发生扭曲和变异，出现偏离标准义的现象，从而获得了陌生化的艺术效果。

（1）墙里的春天，不过是虚应个景儿，谁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墙里的春延烧到墙外去，满山轰轰烈烈开着野杜鹃，那灼灼的红色，一路摧枯拉朽烧下山坡子去了。（《沉香屑·第一炉香》）

“烧”这个动词本义是“使物着火”，这里则是形容野杜鹃漫山遍野地生长的繁茂景象。张爱玲在这里以女性的细腻，描绘出了野杜鹃开放时那灼灼的红色仿佛是火一般在燃烧着。这样既描绘了花的繁茂，更写出了房子周围的背景，也暗含了房子的主人也如杜鹃那般野，行为不检点，故也像野杜鹃花那样从墙里烧到墙外。

（2）第二天，乔琪接二连三的向薇龙打电话，川流不息地送花，花里藏着短信。（《沉香屑·第一炉香》）

“川流不息”是谓河水流动不停。亦形容事物像水流一样连续不断地行进。这里则以夸张的笔墨写出了乔琪给薇龙送花的频繁，诙谐地讽刺了这位混杂着多种血统的花花公子的过度殷勤和滑稽，颇有语味，令读者忍俊不禁。在特定语境中，将描写流水性状的语词移来描写人的殷勤，不仅增添了语言的新奇感，而且传达出了常规语义难以体现的韵味。

（二）超常改装

现代汉语语词的构件一般不可随便拆卸或改装，张爱玲却不囿于语言常规，别出心裁地将语词的构件置换改装，使其新奇化，并滋生新的语义，从而传达特殊的意味。

(1)他们三个人，眉毛官司打得热闹，旁观者看得有趣，都忍不住发笑。（《沉香屑·第一炉香》）

“眉毛官司”是对成语“笔墨官司”的改装，给读者既熟悉又陌生的视觉感受，用以比喻人物之间眉来眼去，关系非常微妙。由于这一临时语词同原成语格式酷似，便于读者将二者联系起来，加以对照，展开联想，从而领会其中特殊的意蕴。

（三）超限组合

在语言组合中，句子成分之间的关系常常受到逻辑语义的制约。张爱玲却突破原有的规范，临时组织新的语义关系，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1)墙里的春天，不过是虚应个景儿，谁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墙里的春延烧到墙外去，满山轰轰烈烈开着野杜鹃，那灼灼的红色，一路摧枯拉朽烧下山坡子去了。

此例属于修饰语和中心语的超语义组合。“轰轰烈烈”原形容气势雄伟或声势浩大，在这里却作动词“开”的状语，把野杜鹃漫山遍野盛开的热烈景象与人类活动的声势浩大相比拟，不仅写出了野杜鹃开放的情状，而且展现了其蓬勃的生命活力，画面感极强，给人以强烈的视觉感受。美就孕育在这种超限组合的过程之中。

(2)在黄梅雨中，满山醉醺醺的树木，发出一蓬一蓬的潮湿的青叶子味；芭蕉，栀子花，玉兰花，香蕉树，樟脑树，菖蒲，凤尾草，象牙红，棕榈，芦苇，淡巴菰，生长繁殖得太快了，都有些杀气腾腾，吹进来的风也有些微微的腥味。

“醉醺醺”原指人喝醉酒失去了常态的样子，用来形容树木，是物理的信息和生理的信息与人们特有的情感信息发生了特异的重组。薇龙由于心情的恶劣，周围的环境也就跟着变得狰狞，树木也就变得“醉醺醺”，周围的植物也是“杀气腾腾”。不仅传达出薇龙在特定情境下的复杂心绪和感受，而且让内心的真诚超越外在的真实，强化了信息接受者的感知效应，激活了信息接受。

变异修辞的恰当运用，使张爱玲小说语言包含着无限的意蕴，显示出不俗的审美价值和艺术魅力。当然，她的小说文本的变异修辞远不止这些，她的小说的艺术魅力也并不仅仅源自这些特殊的表现方式，本文只是初略地进行探讨。

七.《沉香屑·第一炉香》色彩词运用

世界因为有颜色而色彩斑斓，语言也因为颜色而变得多姿多彩。著名女作家张爱玲善于选取各种颜色对她笔下的女性进行刻画，对景物、时代环境进行描写、渲染。可以说善于运用色彩词进行描写是张爱玲小说的一大特色，这一特色使得她在20世纪40年代女性作家中独树一帜。近年来，有不少学者对张爱玲的小说进行研究，其中不乏对张爱玲小说色彩词的研究，但针对具体小说的研究却较少。本文从张爱玲的代表作《沉香屑·第一炉香》入手，具体研究《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色彩词的运用及表达效果。

（一）色彩词的构成

色彩词是一类用颜色来描写客观事物性状、情态的词语，它在文学作品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在现代汉语中，通常把色彩词分为单纯色彩词、复合式色彩词和附加式色彩词三类。

1. 单纯色彩词

由一个语素构成的，表示单纯颜色的词叫作单纯颜色词，如红、橙、黄、绿、青、蓝、紫、白、黑、灰等。这些词虽然不多，但却囊括了颜色的所有种类。在现代汉语中，这些词的后面可以加“色”，如红色、黄色、白色、黑色等，但它们所表示的颜色与不加“色”相同。

2. 复合式色彩词

由两个或两个以上语素组成，表示纷繁复杂的颜色。根据语素间的意义关系，这类色彩词可分为组合式、形容式、指称式和借物式四种。

组合式色彩词由修饰色彩语素加上色彩语素组合而成，如粉红、乌黑等。

形容式色彩词指后一个词根是单音节色彩词，前一个词根对后一个词根加以修饰。在程度上进行修饰的色彩词有深红、浅绿、淡紫、淡黄等，在性状上进行修饰的色彩词有鲜红、暗红、嫣红等，用颜料的颜色、产地来修饰的色彩词有永乐红、景泰蓝等。

指称式色彩词指用表示颜色的事物名词来限制或修饰色彩词。事物名词对单音节色彩词起限制作用的有银白、乳白、象牙白等，事物名词对单音节色彩词起修饰作用的有雪白、火红、漆黑等。

借物式色彩词指借用某事物的名称加上“色”构成色彩词。这类词灵活性较大，构成的词语也较多，如石灰色、咖啡色、象牙色等。

3. 附加式色彩词

指单音节色彩词加重叠后缀或其他词缀而构成的色彩词。其中最常见的是“ABB”式，如绿油油、红灿灿、黄澄澄等。也有少数词语，如紫不愣、灰不溜秋、黑咕隆咚，也可算作附加式色彩词。

（二）《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色彩词分析

张爱玲曾在《自己的文章》中说到：“我不喜欢壮烈。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乏人性。悲壮如大红大绿的配色，是一种强烈的对照。但它的刺激性还是大于启发性。苍凉之所以有更深更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从中可以看出张爱玲的创作追求：悲壮、苍凉。为了达到悲壮、苍凉的效果，她在文章中大量运用各种冷暖色调的色彩词，把难以言说的感情视觉化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形成一种视觉上的冲击。《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张爱玲大量地运用色彩词语进行描绘。据统计，文章中出现的色彩词主要有红、黄、绿、蓝、白、黑、金、青、紫九大类。

张爱玲如同一位画家，将五颜六色变换地运用到文字中，让读者在阅读中仿佛置身于色彩斑斓的画中，从而产生强烈的视觉想象和色彩画面感。

（三）《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色彩词的运用

张爱玲偏爱颜色，并且把这种偏爱带到了文学创作中。在她的作品中，色彩词信手拈来，成为了她小说的一大特色。但这些色彩词的运用不仅仅给读者带来视觉上的冲击，更是为作者想表达的思想感情服务。色彩词的运用对渲染环境气氛，刻画人物，展现人物心理等都具有重要作用。

1. 以色彩来描写景物，渲染环境氛围

色彩对景物的描写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用色彩来描写景物、渲染环境氛围、揭示人物

的生存环境、暗示人物的命运，是张爱玲小说色彩词运用的一大手段。

《沉香屑·第一炉香》的开篇葛薇龙初到姑母家，就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这园子好像一只“金漆托盘”，四周围着“矮矮的白石字栏杆”，白色的屋顶上盖着一层“仿古的碧色琉璃瓦”，绿色的玻璃窗配着红黄相间的边框，铺着红砖的走廊……这种强烈的色彩对照给人以一种不真实感，“造成一种奇幻的境界”。红、黄、绿、白各种颜色夹杂在一起，既使人眼花缭乱，又将一个富丽堂皇的豪宅呈现在读者眼前。同时通过对这种中西结合的建筑风格的描写，暗示 20 世纪 40 年代的香港在西方殖民地统治下的不伦不类，以及在这种统治下香港小市民的荒诞、滑稽。而主人公薇龙正是被眼前的豪华景象所迷惑，以致一步步堕落。

当薇龙第一次从姑妈家出来，走在路上“再回头看姑妈的家，依稀还见那黄地红边的窗棂，绿玻璃印着海色。那巍巍的白房子，盖着绿色的琉璃瓦，很有点像古代的皇陵”。依旧是姑母的家，近看时豪华、奢侈，美得无与伦比。可当薇龙站在山下看时，这些白的、绿的、红的搭配在一起却又看起来十分恐怖，仿佛是“古代的皇陵”。这里的“皇陵”既是薇龙以后的生活场所，同时也是坟墓的象征，暗示薇龙将在这里葬送自己的青春，一步步走向人生的堕落，无法自拔。

2. 以色彩来描写人物，塑造人物性格

用色彩来描写人物、塑造人物性格，是张爱玲小说色彩词运用的常用手法。张爱玲在刻画人物时，不仅通过色彩来描写人物的肖像，而且对人物的服饰、配饰也作了细致的描绘，通过这些浓厚的色彩描写来展示人物独特的性格，塑造丰满生动的人物形象。

梁太太一出场便是一个娇小的西装少妇形象。一身黑，黑色的帽檐，绿色的面网，面网上扣着绿宝石蜘蛛，“亮的时候像一颗欲坠未坠的泪珠，暗的时候便像一粒青痣”。她的脸“白腻中略透青苍”，嘴唇抹着紫黑色的胭脂。黑色、绿色的搭配让人觉得艳俗，而这黑色、绿色遮盖下的苍白的脸更让人感到恐怖，将一个冷酷、阴冷的形象呈现在读者眼前，而她也正是薇龙走向堕落的幕后黑手。

再如对周吉婕的描写，一个十五六岁的混血女孩，雪白的脸上却是“淡绿的鬼阴阴的大眼睛，稀朗朗的漆黑的睫毛，墨黑的眉峰，油润的猩红的厚嘴唇，美得带点肃杀之气”。作者将一个香港交际花的形象活脱脱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既可以看出周吉婕在交际场上的成熟、老道，也表达出作者对年轻的少女在这种时代环境中被摧残而堕落的惋惜、悲叹。

3. 以色彩来塑造意象，展现人物心理

张爱玲善于利用各种意象来展现人物复杂微妙的心理，同一意象的不同色彩会传达出不同的心理感受，产生独特的艺术美感。《沉香屑·第一炉香》中最突出的就是月亮这一意象的运用。月亮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人物面前有着不同的颜色，展现了人物不同的心理。

薇龙第一次去姑妈家，从姑妈家出来，那月亮是白而晶亮的，像“一头肥胸脯的白凤凰”，这里的月亮象征着一种诱惑，表达薇龙复杂微妙的心理波动，奢靡生活、爱欲的诱惑使得薇龙惘然而又不知所措。

薇龙和乔琪乔第一次见面的晚上，月亮是黄黄的，像“玉色缎子上刺绣时弹落了一点香灰，烧糊了一小片”。这里的月亮既象征着薇龙与乔琪乔朦胧的爱恋，同时也暗示了薇龙爱情的残缺不全与爱情悲剧。

乔琪乔偷偷潜入薇龙房间的那个夜晚，月亮好像一团蓝阴阴的火。这“蓝阴阴的火”便是乔琪乔阴邪欲望的象征，而正是乔琪乔的阴邪欲望，薇龙最后成为了乔琪乔赚钱的工具。

色彩语言是文学作品中经常使用的一种表现方式，但像张爱玲这样在文章中大规模频繁地使用色彩词的却绝无仅有。张爱玲将自己对色彩的独特理解和独特视角所形成的色彩语言融会贯通于她的文章中，不仅通过色彩词来造成读者感官上的冲击，更是在色彩的描写中蕴含着深层寓意，使色彩语言成为她渲染环境氛围、塑造人物形象、展现人物心理的有力工具，给读者描绘了 20 世纪 40 年代香港的生存现状和普通女子的悲剧命运，使文章呈现出一种苍凉、悲壮之美，也使张爱玲小说具有经久不衰的独特魅力。

八.《沉香屑·第一炉香》叙事策略分析

《沉香屑·第一炉香》是张爱玲的处女作和成名作，也是其重要代表作之一，于 1943 年发表在张恨水主编的《紫罗兰》杂志上。小说讲述的是 20 世纪 30 年代女学生葛薇龙从上海到香港后，住进做交际花的姑姑家中，爱上了并嫁给了花花公子乔琪，成为姑姑和丈夫的工具，在都市金钱社会的诱惑逼迫下走上堕落人生的传奇故事。

其实，《沉香屑·第一炉香》故事情节上未见新意，本文的成功主要是得益于张爱玲对于题材的处理和叙事手段的运用，才使它成为一部现代叙述艺术的精品之作。因此对这一文本的分析，如果仅仅停留在一般意义上的艺术特色的总结上，是不足以挖掘出它的深层艺术魅力的，本文拟以分析作品的叙事学理论为依据，从叙事视角和叙述时间这二个具体的叙事元素入手，来阐释张爱玲独特的叙事策略，揭示其审美价值。

（一）叙事视角：全知叙事与限知叙事的杂糅

叙事视角是小说叙事者的立足点和观察角度，热奈特把叙事视角称为聚焦，“传统上的‘视角’一词至少有两个常用的所指，一为结构上的，即叙述时所采用的视觉(或感知)的角度，它直接作用于被叙述的事件；另一为文体上的，即叙事者通过文字表达或流露出来的立场观点、语气口吻，它间接地作用于事件。”事件在叙事视角的关照下，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因此视角的选择本身就隐含着叙事判断和价值倾向，作为一种重要的形式技巧和叙事策略，叙事视角在叙事文学中的作用自然是不言而喻的。杨义在他的叙事学专著《中国叙事学》里对叙事视角的地位作过这样的评定：“聚焦的选择包含着深刻的价值选择，解剖聚焦所在在相当的意义上乃是解剖叙事文本的价值所在。”叙事视角规定了叙事者的权限，从视域的限制分类来看，叙述视角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全知视角，限制性外视角，限制性内视角。

《沉香屑·第一炉香》以与传统小说相似的全知叙述方式为主，并采取全知叙事与限知叙事杂糅的模式，在文本中，全知视角和限知人物视角都被大量运用，呈混合型叙事模式——叙事者一面纵观全局，对故事中的人与事做全景式描写，另一方面叙事者自行隐退，频繁使用故事中人物的视角描绘，极大地丰富了主题思想。

在文章开头，作者沿袭了中国传统白话小说的叙事格局，以第一人称塑造一位类似传统小说中的说书人的角色，即叙事者“我”，从而为全知叙事模式奠定了基础。原文是：“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听我说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您这一炉沉香屑点完了，我的故事也该完了。”结尾是同样的叙事风格：“这一段香港故事，就在这儿结束……薇龙的一炉香，也就快烧完了。”由于叙事者作为一个知情者与观察者，属于虚构故事之外的人物，这样就提高了作者的客观可信度，既增强了权威性，又营造了一个叙事场，

与读者直接交流。

小说的主要情节大体采用了全知叙述这种模式，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我们时时都能感觉到这种叙事者的在场，

自由地叙述和描绘人物、事件，掌握和控制小说的发展和人物的命运，不受情节发展的时间和地点的限制，且叙事者在叙述的同时，经常直接介入他所叙述的世界，发表评论，如在葛薇龙试穿姑母给她置备的衣服一节中，全知叙事者出场评论：“她到底不脱孩子气，忍不住锁上了房门，偷偷的一件一件试着穿。”这样的评论在文本中多次出现，不一一列举。

根据故事情节的需要，尤其是刻画人物性格的需要，文本没有受到单一的全知视角的限制，在叙述中巧妙地采用第三人称人物有限视角叙事，即“放弃自己的眼光而采用故事中人物的眼光来叙事”。叙事者不再代替人物去思维，而是作出标志让人物自己去活动，人物由此而获得了生命力。读者随时切身地体悟叙事者和人物最隐秘的心理变化。

在乔琪深夜与女佣厮混这一情节，为了防止叙事者过分周到而使文本叙事失真，叙事者有意在叙事的某些阶段把叙事视角转换成限知视角叙事，叙事者频繁进入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其过程几乎贯穿故事所有情节，利用内部聚焦来展现人物的心境。

如：“香港有一句流行的英文俗谚：‘香港的天气，香港的女孩子。’两般两列，因为那海岛上的女孩子，与那阴霾炎毒的气候一样地反复无常……”可看作是全知叙述，而接下来，事件便在不同人的视角中进行。首先是乔琪的视角：“乔琪吃了一惊。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去纱大脚裤。……不是睨儿是谁呢。”接着视角转到薇龙在阳台上发现了这二人：“忽然阳台底下一阵脚步响，走来了一个人。薇龙想道：……”

然后是梁太太知道此事的一系列反应：“梁太太听了，点头不语，早把实情揣摩出了八九分……”接着又转回到全知视角：“梁太太赔了夫人又折兵，身边出色人材，全被他一网打尽，如何不气？”

人物限知视角使事件中各人物有了更多的话语权，有效地缩短了读者与人物的心理距离，由于情感的拉近，“这些叙述人，无论多么的人，多么有局限，多么迷惑不安，都赢得了我们最基本的信任与赞成。”从前面的分析中可知，全知视角和限知视角的交叉使用，产生优势互补，叙事效果发生了奇妙的变化，既使叙事的真实性不受损害，又给叙事者更多的自由空间，既能保持全知视角的冷静和客观，又拉近了作者、读者与人物的距离，使读者深切感受到故事人物的情感和内心世界，不知不觉将同情偏向女主人公，了解她“内心视角提供的内心历程愈深刻，人们愈容易心甘情愿地信赖叙事者，愈会对他具有同情感。”从审美角度上看，这种杂糅的叙述视角的叙述手法使小说中的故事产生了一种立体感，增强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

（二）叙事时间：时序和时距

按照现代叙事学的观点，叙事时间就是“故事与本文之间按年月次序排列的关系”是叙事策略的重要环节。叙事作品必然涉及两个时间：故事时间和叙事时间，故事时间是指故事发生的自然时间状态，而叙事时间是叙事者按照一定的叙事策略，把故事情节重新剪辑，对故事时间加以描绘形成的文本时间。由此看来，故事时间和叙事时间并不一致，作家可以任意打破故事时间序列，在作品中重新组合，显示出特殊的艺术意味来。

西方叙事学理论特别重视对叙事时间的建构。热奈特曾宣称：“我讲一个故事，完全可

以不说明故事发生在何处，只要这个地方离我讲故事的地方相对来说比较遥远。但是，我几乎不可能不说明，相对于我的叙述行为来说，故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因为，我在讲故事时，必须使用现在时、过去时或者将来时。”

从叙事时间的角度来看，张爱玲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就很好地把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有机结合，融为一体，潜心营造了一种特殊的叙事形式。作品文本叙述是现在时态，故事的背景时间大多是过去时态。现在和过去这两个时间系统形成的时间差，打破了故事时间的自然序列，使作品在叙事时间上显示出特殊的形式意味。叙事时序在粗线条结构上是逆时序，即故事时序与叙事文本时序之间是不协调的关系，这在开头和结尾处的叙事效果上清晰可见：作者借用“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的时间意象，把葛薇龙的故事压缩在“一炉沉香屑点完了”的时间段里，以叙事者身份首先营造出的是一种阅读过去与讲述现实之间的不和谐，蕴涵了作者对叙事时间的独特理解：营造文本过去时与现在时叙事的气氛，一种具有对立性质的时间策略，叙事时间的巧妙使文本结构成为一个精美的完型。

叙事时间问题涉及到时序，时距和频率三个方面，频率简单说就是重复关系，由于《沉香屑·第一炉香》的叙述频率几乎均是单一性叙述，即讲述一次发生过一次的事，所以我们只从时序和时距两方面入手来分析。

首先是时序，热奈特认为，时序问题主要研究“在故事中，事件接续的时间顺序和在叙事中排列的伪时间顺序的关系”故事发生的时间是立体的，而叙事时间是线性的，二者在大多数时候是不一致的，顺序的先后，会产生截然不同美学效果。

在具体追述的过程中，故事的发生发展，即叙述葛薇龙从一个女学生慢慢变成一个交际花的历程，时间是连贯的、明晰的，只有在开头部分出现了短短的一处补充性追述，以葛薇龙的角度，回忆姑母当年与家里闹翻，嫁给富商的往事，是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时间流程的叙事逻辑，出现的时间暂时性断裂。

预述也只在结尾处闪现：“她在人堆里挤着，有一种奇异的感觉……”

其次是时距。时距是指故事时间和叙事时间的长度比较，时距问题涉及到故事的强度、速度和节奏。热奈特依据故事时距与叙事时距(伪时距)的关系，把叙事划分为四种类型：概略叙述、省略、描写停顿和场景描述。具体地说：概略叙述即是“用几段或几页来叙述几天、几个月或几年的日子，情节和话语都不带细节。”它接近于我们常说的叙述，以极灵活的形式覆盖场景和省略之间的整个领域，概略叙述一直是场景之间最通常的过渡形式，是小说叙事的最佳组织形式。

省略是原文没作交代，读者只能根据某个时间上的空白或叙述连续性的中断来推测。“从时间角度讲，对省略的分析就在于研究被省略掉的故事时况。”省略和停顿是相对的，省略是极快的叙事运动，而停顿极慢。

描写停顿是故事中的人物暂时退场，在做自己的事，只有等叙事者回到他们身上，才继续他们的故事。“叙事者在这里为了给他的读者提供某种情报，丢开故事进程不管，以他个人的名义描写一个场面，在故事的这个点上，没有任何人观看这个场面。”场景描述是代表着以后的一系列相仿的，不再加以叙述的场景，与概略叙述形成对照的较为详细的场景叙述。

“小说规范的真正节奏，就在于起等待和联贯作用的非戏剧性概略与起决定性作用的戏剧性场景之间的交替。”一般认为用直接引语叙述出来的人物对话为最典型的场景描述，对事件

过程的详细描述也被认为是场景叙述。

叙事时间在时距上的变化使文本结构显出极强的节奏感：疏密有致，张弛得法。因为如果作者对每一故事的每一时段都平均用力，就极有可能没有一处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因而在故事时距安排上，就把某些细节突出显示出来。

小说中，张爱玲通过人物生活经历的叙述，形成了一种的特殊叙事时间，巧妙地切断了现实时间的自然衍进，打破了故事时间的线性延展的特点，小说的基本情节在概略叙述与场景的相互交替中进行，而场景占很大的比重，运用省略和停顿来衔接故事，省略和概略叙述作铺垫，集中勾画生活表象和重要事件、主要场景。

故事的开端，叙述时间是缓慢的，葛薇龙初次到姑母家所见的别墅景物是描写停顿，而在梁太太家里的一些日常生活状态十分简略，几乎都是一笔带过，交代姑母当年与家里人闹翻嫁人豪门是概略叙述，作者花费了大量笔墨写薇龙初人姑母家见面的场景，在这一个个场景描述之间，并没有按时序进行严格交待，而是果断地省略。如薇龙“主意打定，便一五一十告诉了母亲，她怎样去见了姑母，姑母怎样答应供给学费，并留她在家住，却把自己所见所闻梁太太的家庭状况略过了。”“薇龙在衣橱里一混就混了两三个月……”

接着作者在叙事中截取生活的片段，走进微观化的叙事时间之内，用了几个场景表现了一个延伸的事件：姑母家的园会，乔琪与丫头调情风波，薇龙生病，游新春市场等，在这些场景描述中，强度增大，叙事速度自然放慢，短暂的时间被延长，充分展示故事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故事发展的高潮，使得叙事线条呈现出非直线的曲折状态，于是出现故事时间长度与叙事时间长度的差距，造成了一种空虚、荒凉的氛围，为全篇带来了诗情画意，吸引读者保持长时间的关注。

叙事者以女性的细腻笔触，用描写停顿的方式，展示葛薇龙在生活中极其琐碎细微的心理，使她的情绪得到了痛快的宣泄。如在葛薇龙看清了乔琪乔浪子的真面目，面对人生选择的紧要关头，却得重病，这时就有一段叙事的停顿：“她躺在床上，看着窗子外面的天……”心像刀子划过般的疼痛，不断延展成一种绝望后心灰意冷的苍凉。

在写到薇龙被梁太太和乔琪乔诱使，一步步远离纯真，滑向深渊时，张爱玲也并不着意铺写所有事件的来龙去脉，概述、省略便起到加快叙事速度的作用，以便于省去难以启齿的内容，如：“薇龙果然认真地练习起来，因为她一心向学的缘故，又有梁太太在旁随时地指拨帮衬，居然成绩斐然。”结婚以后，做交际花的日子是这样写的：“从此以后，薇龙这个人就等于卖给了梁太太和乔琪乔，整天忙着，不是替梁太太弄钱，就是替梁太太弄人。”这段极为省略的经历也许是薇龙最惨痛、最隐秘的心灵煎熬，对她来说，是度日如年，不堪回首，由于时间被压缩而加快了事件发展的速度，突出了人物巨大的心理变迁，加深了薇龙命运的悲剧性，同时给读者也留下了想象的空间，去揣测人物内心的绝望与悲凉，使人倍感悲怆。

在结尾处的场景渲染中，叙述薇龙与乔琪乔大年三十夜晚到湾仔看热闹，葛薇龙觉得自己就像湾仔的妓女：“她们是不得已，我是自愿的！”这就是薇龙的现实与未来，理想的幻灭和人格的崩溃给读者带来深深的震撼。

总之，张爱玲小说在这篇小说中运用的卓有成效的叙事策略，灵活转换的叙事视角、时间倒错的叙事时序，生动地描述了故事人物的悲剧命运，含蓄地揭示了现实社会的冷酷，使得故事气氛扣人心弦，人物形象丰满生动，更增添了故事的艺术感染力，赋予作品强大的艺

术魅力。

九.《沉香屑·第一炉香》的女性形象与悲剧底色

（一）时代困境下出走的女性形象

1923年，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上演讲了《娜拉走后怎样》，“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影片《沉香屑·第一炉香》所发生的时代背景就是这样一个意识觉醒的女性反叛父权，逃离父亲统治的旧家庭。但是她们出走后仅供选择的也就只有堕落和回来两条路。为什么？因为“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沉香屑·第一炉香》通过描绘出走的女性形象，即挣扎谋生和卑微谋爱的女性，回答和探讨了时代困境下娜拉出走后的故事。影片塑造的女性形象有以下五类：以葛薇龙母亲为代表的旧式封建家庭的女性、以梁太太为代表的走出旧家庭的女性、以葛薇龙为代表的接受教育的新式女性、以周吉婕为代表的接受西式教育的殖民地混血女性，以丫鬟为代表的受人摆布的女性。这些女性都以找到一个好归宿为最终人生目标，其中出走的女性有两位梁太太和葛薇龙，二人展现了当时女性出走后艰难挣扎的求生和谋爱之路。

1. 挣扎谋生的女性

五四时期出走后的女性不想回归旧家庭，就只有挣扎谋生这一种可能，但是可供女性谋生的道路太窄。相比于影片中所呈现的男性形象：拥有财富的司徒协、拥有社会地位的乔诚、浪荡公子哥乔琪乔、出国留学的卢兆麟，女性总是以依附者，即符合社会性别体制下的形象出现：照顾起居的奴仆、撑牌面的姨太太、多才多艺的讨好者、温顺的被包养者、能够挣钱的妻子、出卖色相的妓女。两性社会地位和财富的极大悬殊，使得出走后的娜拉谋生格外艰难。她们只是从一个家庭出来，逃离结果有两种：最终回归另一个家庭，把自己异化为色相市场的商品才能活下去。女性如果不走这条路，那就只有恋爱、结婚，建立新家庭。而梁太太和葛薇龙作为出走者就是这样两种结果的写照。

梁太太作为走出旧家庭并与原生家庭关系破裂的女性，与旧家庭的决裂和出走行为并没有使她获得自由，而是戴上人生的另一副枷锁走进了婚姻，遂成为另一个旧式家庭的传统女性。影片在展现薇龙与乔琪结婚留影时，混出头的梁太太作为薇龙家长庄重地站在人群中，闪回了当年她远嫁富商做姨太时的卑躬屈膝——封建礼教束缚了她结婚时的着装及行动，她不仅没尊严，也无法满足那旺盛的情欲，直到丈夫下葬，开始了骄奢淫逸的日常。但要满足奢靡日常并非易事，而拥有财富和权力的男人成了她的猎物，为了欲求和享乐甚至不惜搭上自己侄女的青春。

以葛薇龙为代表的接受教育的新式女性，离家原本是为了继续自己的学业和将来谋生做打算；因为摆脱了自己的家，这是最终的断奶：正是在这时，她经历了被抛弃引起的一切焦虑和自由带来的眩晕。一开始的薇龙未经世事一心向学，两个关键点使她改变初心：第一，司徒协用手镯把她和梁太太镣铐住。第二，病愈后薇龙准备离港，拿自己的竹布衫与华服难以抉择，此刻她的人性已被物化难以回头。对于薇龙来说，即使顺利完成学业未来也仅仅是当个薪资微薄的教员，奢靡享乐的交际生活使得她沉迷于人生捷径，从此走上依附之路。在司徒协的物质供养下，她活在被男人支配的荫蔽下，从而丢掉自我的独立性——过上了一边忙着为丈夫弄钱，一边替梁太太弄人的婚后生活中。

2. 卑微谋爱的女性

女性接受了教育鼓足勇气走出去，有了人生飞扬一面，但出去之后呢？在她面前并未有别的出路，也唯有谋生谋爱自求安稳。《沉香屑·第一炉香》除了刻画出挣扎谋生的女性形象外，也为我们细描出卑微谋爱的女性形象——情欲旺盛的梁太，为爱堕落的葛薇龙。

梁太在丈夫死后开始了自己的纵欲生活，年老色衰的她一边对老男人百依百顺，一边又渴望年轻男人的身体，养了两个青春正茂的小丫头替她吸引男人，侄女的到来也列入了她寻求欲望的计划。在乔琪乔与葛薇龙趁着夜色私会温存的同时，采用交叉蒙太奇细化填充了此刻二人的缠绵与深夜梁太惊醒后点烟冥想的内心孤寂，形成了对照；强化了一个并不满足于物质生活现状，且深夜欲火旺盛但孤独无依的女性形象。葛薇龙从一个一心求学的女学生，沦为灯红酒绿的社交场里姑妈谋爱的工具，到堕落为爱而放弃学业和正经工作，还要为梁太太弄人，给丈夫弄钱，“抓住”丈夫是一门艺术，“留住”丈夫是一门职业。迈出家门的女性，貌似获得了自由，却也不得不面对生存的基本需求，葛薇龙只能奔忙于交际生活，却难逃最终青春被埋葬在梁宅的覆辙。那些在时代中挣扎着的娜拉们，也只能走向自己貌似主动实则被动的弯路。对葛薇龙来说也只有在湾仔集市上微笑道出那句“我爱你关你什么事？千怪万怪也怪不到你身上去”。女性被时代压抑着，连追求爱情都是一种隐没到内里的卑微和人生命运的无奈与苍凉，影片结尾一改原著小说中薇龙坐在车里饮泣，葛薇龙想让沉默的丈夫表达出来同等分量地爱，自我流露出对丈夫的爱和抱怨地呼喊：“我爱你——一个没良心的。”丈夫的爱就像燃烟的火星一样——开始来得热烈，结局只剩下黑暗中的对婚姻的满不在乎。葛薇龙寄托于男性的卑微谋爱行为，如同蜜月时飘摇的小船上她手中握住的冰块一样，这不同于年少发烧时握住父亲镇纸的坚实且冰凉的玻璃球，谋爱带给她的只能是冰化水后的无法掌控的人生命运，婚姻也像这只飘摇不定的小船，并不能给她带来理想中安稳的生活。

梁太太从“谋生”到“谋爱”，葛薇龙从一开始的“谋生”到“谋爱”再到“为爱而谋生”，她们都没有获得作为个体的独立性。即便是爱情也难以给出走的娜拉们指出一条生存和成长的阳关大道，她们一直在崎岖的羊肠小径里步入歧途。影片只是呈现女性出走后所需要面对的现实世界，却并未对造成悲剧命运的女性形象原因进行分析。

（二）时代困境下的悲剧底色

《沉香屑·第一炉香》通过对女性命运“悲”的叙事讲述和悲剧审美内涵的升华，表现出时代困境下的悲剧底色。我们通过探讨造成悲剧命运的女性形象原因和影像美学中审美内涵的分析，也能对当下女性所面临生存困境进行反思。

1. 父权制下作为附属品的悲剧命运

女人之所以变成《第二性》中的他者和男性附属品，是时代并未提供给女性应有的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因此女性的主体能动性必然受到制约，造成悲剧命运的女性形象原因，并不仅是女性自身，还有以下两点：男性的主动导致作为“他者”女性的被动处境，时代挤压女性的生存空间。

第一，男性的主动导致作为“他者”女性的被动处境。女人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有另外一群人的作用，那就是男人，女性是被造成的。以父权制为代表的男性家长气质，不仅仅占有政治、经济和生活资源，还束缚女性身体和精神发展，要求女性服从于父亲，丈夫和兄弟。这也就有了《沉香屑·第一炉香》故事发生的原因：葛薇龙因父亲对家庭经济权的掌控，不再支持自己香港的学业，于是来到姑妈处求接济。男性对其命运和人生走向掌握着主动权，

男性以父亲、包养者、暗恋者、丈夫的社会身份出现，他们参与抉择了葛微龙之后的人生走向。父权制的意识形态褒扬男性价值、贬低女性价值，这不仅会伤及女性，也伤及了男性自身，如乔琪乔作为儿子被父亲看不起。葛微龙无论是作为女儿、被包养的情妇、妻子，都不是自己的主动选择，父权制将不平等的性别意识合法化，并形成代际传递。作为“他者”（第二性）的女性相比于拥有社会地位的男性处于被动处境，于是丢掉了自己的女性意识。姑且将“出走”作为一种女性意识的觉醒，但出走后的代价说明女性的社会意识，即她们对自我所受到的压迫并未真正觉醒。因为面对谋生和谋爱，“葛微龙”们并不具有主观能动性，出走后的发展空间和主体性获得对她们来说太过艰难。因此回归家庭的葛微龙不仅要面对着丈夫的不忠，还要混迹于男性主导的公共领域进行谋生，甚至面临年老色衰后被男人抛弃的危机。

第二，时代挤压女性的生存空间。这也体现在国难时期人们对女性的看法上。“国难期间似乎女人也特别受难些。奢侈和淫靡只是一种社会崩溃腐化的现象，绝不是原因。私有制度的社会，本来把女人也当做私产当做商品，一切国产，一切宗教都有许多稀奇古怪的规条，把女人看作一种不吉利的动物，威胁她，使她奴役般的服从，同时又要她做高等阶级的玩具。”个人际遇的兴衰荣辱，与生存空间的逼仄和广阔，都与时代境遇紧紧相连。家庭条件一般的卢兆麟成为梁太新欢后可以继续出国深造自己的医学学业，影片尽管没有交代他的后续，但可以想象学成归国后的他将拥有更好的机遇和人生前景。而葛微龙的人生选择是结婚。男性在公共领域活跃，女性可选择的出路只有回归家庭这个私人领域，并依靠男人。选择不专情且没有经济能力的乔琪乔结婚，注定两人的关系不平等。而她的谋生之路靠着年轻，多才多艺和色相，只剩下被司徒协包养去堕落这一条路走。影片结局给我们呈现了湾仔集市上被两个英国大兵架着走的雏妓，她们是时代困境下女性在艰难空间中生存的写照。

2. 影片悲剧的审美底蕴

《沉香屑·第一炉香》尽管不似西方酒神颂呈现出一种崇高的悲剧感，但却有一种东方含蓄式的隐喻，即人生难以托付的苍凉韵味。正如德索所言，真正的悲剧并不解决冲突，它只能让人们看到，在世界上、生活里存在着无论如何都无法平衡的矛盾。无情的命运总是无法消除那些罪过与天真。影片悲剧的审美底蕴体现在影片细节刻画中：坟墓般的别墅装潢，注定了住在里面女性前途被葬送；而梁太就像那只雄孔雀标本死物件一样，尽管外表保养得当，但内里清楚自己青春被葬送后的毫无生气；养在花盆里鲜红的杜鹃花隐喻着命运被掌控的年轻女仆；月亮在影片中除了交代时间的作用外，这一圆月意象并不象征着美好、思念与团圆，它象征着乔琪乔与葛微龙私会所达到的关系顶点，之后二人关系将月满则亏；司徒协的手镯隐喻着男性对女性的选择所导致女性的被动处境。受教育的女性选择做出走的娜拉，她们同样面对着走后生存的难题。女性在见识过世界的奢华与享乐后，难逃物质化的诱惑，因此像葛微龙这类极其普通的上海市民阶级的女子大抵是回不去旧日的生活了。在追求奢侈浮华的生活并且受挫时，时代困境下无助的她们只能依附于男人，能走的路只有姑妈的覆辙——她被人支配的命运是基于不幸、基于自身与世界的不和谐、更是基于张爱玲对普通女性人生命运与情感归属苍凉悲悯底色的洞察。

《沉香屑·第一炉香》选择张爱玲初露文坛的《沉香屑·第一炉香》进行改编，呈现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转型社会，这些受到教育的旧式小姐在转变成新女性的失败——女性意

识并未真正觉醒。呈现出时代困境下狭小的女性生存空间。伴随着 1995 年联合国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京召开，此次会议使得用女性眼睛看世界得以流行，也加速了性别平等和女性赋权等议题的讨论和提案项目的实践。尽管张爱玲对五四时期的女性早有觉察与审慎，其笔下的女性充满了悲剧底色和人生悲凉的况味；但两性不公平导致女性生存的困境，一直是时代发展亟须解决的问题。女性应当拥有自己的独立性，走出去，拥有广阔和包容多元性的生存空间，而不是将归宿寄托于稳定的家庭。《沉香屑·第一炉香》回答了无论过去抑或当下，女性出走需要面对的生存困境，但并没有给出解决办法。尽管女性主义正在经历全球第四次浪潮，但是女性生存空间受到挤压依旧是女性主义讨论的永恒话题。通过对影片所塑造挣扎谋生的女性形象，或许可以引发当下更多关于女性处境的思考：性别的刻板印象、两性职业公平、经济收入对比，婚姻法的合理性等。当下女性主义的文化思潮影响着两性，女性意识也有了反压迫的践行，出走后的女性可供选择的机遇并非如鲁迅所言“不是回来，就是堕落”。她们的选择可以更加多元。因此，《沉香屑·第一炉香》不仅仅是把女性话题再次带入人们的视野，同样它也可以让我们思索过去导致女性悲剧形象和命运的原因，从而反思当下及展望未来两性平等及女性赋权的措施和发展。

十.《沉香屑·第一炉香》中主人公的身份焦虑

殖民地香港的鱼龙混杂、中西合璧的大环境，香港当局和主流社会对西方男性殖民者的迎合，本土文化的边缘位置和“失语”状态，都让身处其中的人们感到了一种身份的焦虑。在这种大环境下，社会中根深蒂固的、由殖民者主导的种族观念，让男主人公乔琪的混血身份得不到承认，无法获得一种归属感，漂浮在其中，无落脚之地；而身处封闭空间的梁宅（香港）中的女主人公葛薇龙因为自己与本土文化的割裂而倍感焦灼，在病中出现了“上海”与“香港”的对立，并且产生了“怀乡”情结，体现了她在香港的无根状态。隐含作者在此基础上理解和同情了自己笔下人物的堕落，并没有简单地进行“善”与“恶”的道德判断，更多的是展现了一种现代人生形态。

（一）根深蒂固的种族观念

张爱玲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呈现的香港是鱼龙混杂的，社会中人种的构成极其复杂，有黄种人、白种人，还有杂种人。但正如梁太太所说，“我们香港行的是英国规矩”，作为殖民者的白种人无疑掌握了最高的权力和话语权，而其他的黄种人和杂种人则被置于边缘位置。作者有意设置乔琪的中葡混血身份（这是一个得不到主流话语承认的身份），揭示了香港根深蒂固的种族观念。通过对乔琪身份的书写，隐含作者在猛烈批判乔琪这个花花公子的同时也给予了他一丝理解和同情。小说通过人物语言侧面反映了殖民地香港根深蒂固的种族观念以及乔琪因其“杂种”人身份而无根的漂浮状态。

1. 侧面反映种族观念深厚小说并没有正面描写殖民地香港深厚的种族观念与乔琪的身份焦虑，而是通过描写与乔琪有纠葛的其他人物——梁太太和周吉婕（乔琪同母异父的妹妹）的语言、叙述语气和语调，侧面交代男主人公“杂种人”身份以及这种身份的边缘位置，反映了殖民地深厚的种族观念和种族界限。

在梁太太的口中，“姓乔的你这小杂种，你爸爸巴结英国人弄了个爵士衔，你妈可是来历不明的葡萄牙婊子，澳门摇摊场子上数筹码的”。言词充满了轻蔑，作为一个香港富商的遗孀或说香港本地人，对于中葡混血的乔琪不甚尊重。“杂种人”的称呼意味着正常身份的

不被承认：没有香港人认为“高贵”的英国血统，同时又不是纯黄种人，在社会中受挤压，不受重视，没有话语权，这多少会导致乔琪心理扭曲，性格阴沉。乔琪同母异父的妹妹吉婕对于这种“殖民地的空气”更为敏感。她在醉酒后的一段独白是对殖民地香港根深蒂固的种族观念的激烈控诉。在恋爱和婚姻中，“杂种人可能对象全是杂种人”反映了种族观念和等级观念的深厚。“没有安身立命的地方”更是道出了她和乔琪这类人无根的漂泊感，漂浮于历史的天空上，没有心灵的栖息之地。

2. 无根的漂泊状态香港长期处于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中，身处其中的人们经常会产生身份认同的危机，“杂种人”乔琪更是繁华都市的边缘人。他像“无脚鸟”一样一直在漂泊，“无根”是他的生命状态。他与王家卫导演的《阿飞正传》中的旭仔(阿飞)同型，都是悬浮在历史舞台上的“无脚鸟”。隐含作者某种程度上体恤了这种因为“无爱的时代”而造成的“无爱的人生”。乔琪因母亲“来历不明的葡萄牙婊子”身份而在父亲身边不得宠，无心学业与事业，游走于各种女性之间，天天只想快活，不想负责任。尽管乔琪表面风光，落拓不羁，但是最终与葛薇龙结婚，并不是他的“浪子回头”，而是与他的经济处境有关，杂种人的身份限定了他的职业和收入，为了不劳而获他甘愿与自己不爱的人结婚。当然，乔琪的自甘堕落并不可取，他不加节制的欲望不仅毁了自己的人生，更是让一个曾经清纯的女学生堕入了无边的黑暗之中。隐含作者对于男主人公的身份焦虑表达得较为隐晦和含蓄，需要读者反复阅读才能够推知，但是对于女主人公葛薇龙身份焦虑的呈现却较为明显，这体现为一种因异乡与原乡在空间和精神文化上的断裂而产生的漂浮状态。

二、异乡与原乡的割裂

在女主人公这个外乡人的视角中，梁宅除了中西对照激烈之外，更因其地理位置的封闭性而产生了断裂性。空间断裂造成了精神文化的断裂。在文中，主人公很少用“家”来指称自己所在的梁宅(香港)，而上海是作为香港的镜像出现的，是异乡人葛薇龙真正的“家”。在香港，本土文化的“失语”使得身处其中的中国内地人无法感受到与原乡的联系，生发出了“独在异乡为异客”的迷惘和惆怅。这与作家 1939—1942 年在香港求学、身为异乡客的经历有关，在此基础上隐含作者比较理解和同情葛薇龙。

封闭空间带来的断裂性从文中看，梁宅与周围环境是隔绝的。主人公葛薇龙第一次拜访姑母时，对于姑母家花园的印象是“栏杆外就是一片荒山。这园子仿佛是乱山中凭空擎出的一只金漆托盘”。“荒山”显示出一种凄凉和孤寂之感，梁宅是高高在上的、不好接近的，它与世隔绝，成为一种封闭空间。

而葛薇龙从姑母家出来后再次审视梁宅，“很有点像古代的皇陵”，“转眼间那贵家宅第已经化成一座大坟山”。“皇陵”象征着权力，至高无上，姑母在这与世隔绝的环境中做着操纵一切的美梦。“大坟山”所呈现的“坟墓”意象，又隐喻着这种封闭性最终埋葬一个时代。

文中写梁宅与周围环境是那样的格格不入，是为了突出一种空间上的断裂性和封闭性。而梁宅的与世隔绝，又隐喻着香港与中国内地地理位置上的隔绝。香港的这种隔绝状态使它像一座“孤岛”，阻断了与外界的交流，空间的断裂又导致了精神文化上的割裂。

(二) 精神文化的割裂

在殖民地香港，葛薇龙逐渐被同化，慢慢舍弃了原先在中国内地中接受的伦理观念和文化观念，“来的时候是一个人……现在又是一个人”。刚开始葛薇龙并不认同自己的姑妈，认为自己绝不会像姑妈那样靠男人为生，绝不会纸醉金迷地堕落下去。但从薇龙的父母由香港

搬回上海这一事件起，标志着薇龙与旧有文化的彻底隔绝与断裂。葛薇龙也就开始了被同化的堕落之旅。如在讨论“贞节”和“名誉”问题时，薇龙与姑妈的交流，自己原先形成的一套文化观念无法带入，并且逐渐抛弃旧有观念，接受了以姑妈为代表的香港话语体系——“一个女人顶要紧的是名誉”，最好的出路就是找个好男人嫁了。

女主人公葛薇龙不仅要被迫接受一套自己原先并不认同的价值体系，而且还要承受自己内心世界的割裂。她在看破乔琪的花花公子本质之后，葛薇龙陷入了痛苦之中，精神上的苦痛导致了身体上的疾病，而在病中，精神的痛苦愈加强烈。在病中，出现了上海与香港的对立，两者互为镜像：“风景自然香港好”，但终究不是女主人公的精神故乡，这里充斥着浮华，让身处其中的人们有漂泊的虚无感；而上海却是“厚实的，靠得住的”，充满温情。这组对比的呈现体现了在殖民地香港文化氛围的浮躁以及话语体系与中国内地传统精神文化的断裂。

小说在故事的结尾部分出现了跳角，由女主人公葛薇龙的视角切换为了男主人公乔琪的视角：“乔琪没有朝她看，就看也看不见，可是他知道她一定是哭了。……花立时谢了，又是寒冷与黑暗……”这是小说中第一次正面呈现乔琪的心理活动，以乔琪的视角为这场悲剧作结，更增添了悲剧意蕴。隐含作者在此表达了对男女主人公的一丝怜悯和同情，以及对这个无爱的时代的无奈。

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写道：“张爱玲是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可是同时又是一个活泼的讽刺作家，记录近代中国都市生活的一个忠实而又宽厚的历史家。她同珍·奥斯特汀一样，态度诚恳，可能又是冷眼旁观；随意嘲弄，都成妙文。”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张爱玲态度诚恳地记录了男女主人公的堕落，有激烈的批判，也有出于时代背景的关怀，客观呈现了他们在殖民地香港中的身份焦虑，给了自己笔下人物宽厚的同情和怜悯。

十一.《沉香屑·第一炉香》女性焦虑意识新解

（一）女性焦虑意识在故事里的定位：张力和魅力

焦虑在这一部小说中充分展现了她的魅力，构成了故事的张力，由焦虑带来的紧迫感和局促感每隔一段就从张爱玲笔下冒出来，像是反转往复的咏叹调，刚结束一段交锋的平静就迎来下一个忙碌的紧张。没有焦虑，故事便失去了劲道，焦虑是这个故事里的盐。焦虑集中展现在故事里的女性角色身上。似乎只有女性，被迫被挤进焦虑的机器里，随着机器开动，开启焦虑的人生扮演。

小说里的女性，有名有姓、笔墨较多的女性人物有五个，主角薇龙，姑妈梁太太，佣人睇睇、睨儿，混血儿周吉婕。这几个女性在故事中处在不同的角度，但是其语言节奏却和焦虑程度做到了同频共振。通过详细的文本分析我们可以展现几个主要女性角色的焦虑感。

1. 薇龙的焦虑：生存焦虑到身份焦虑

来自上海的中学生葛薇龙，由于家庭经济原因，投奔有钱的寡妇姑妈梁太太，期望姑妈资助她在香港继续求学。在薇龙这里，最初的焦虑来源就是自己的家庭经济无力支撑她的学业。在她的角度想到的最好的最省心的方法就是去攀上已经和她的家庭脱离关系的有钱姑妈。她当时的计划很清楚，并不是莽撞地敲开姑妈家的门的，她制作了完整的人生计划，只是现实大大超过她的计划。

及至后来，她成为一名“港上名媛”。她开始追求和期待爱情，白日梦越做越大，期待

越多，焦虑也越多。彼时她的焦虑已经从最初的生存焦虑转变为身份焦虑，她想“堂而皇之”地拥有一个自己的位置和名字，从而固定一个身份。故事的最后，虽然薇龙拥有了乔太太的身份，但是和她原先构想的相去甚远，于是，她依然存在身份焦虑，她无法把自己和庙街上的妓女严格地区分。

“本来嘛，我跟她们有什么分别？……她们是不得以，我是自愿的！”

一句和乔琪乔呛嘴时的话也是她最真实的焦虑所在，如何定义自己的身份仍然是她最在乎的事情。

2. 姑妈的焦虑：情感焦虑到归属焦虑

姑妈梁太太的焦虑也有一个转变的过程。她是一个有钱的寡妇，嫁给富商做姨太太后若干年，随着富商的离世，她恢复了自由身，然而她却充满了危机感。她意识到自己的年老色衰，经常请一些年轻的姑娘到她的沙龙里来吸引男性，这种危机感显示出她的情感焦虑。

他死了，可惜死得略微晚了一些——她已经老了；她永远不能填满她心里的饥荒。她需要爱——许多人的爱——但是她求爱的方法，在年青人的眼光中看来是多么可笑！表面上看，姑妈在和自己的侄女争风吃醋，看好那些年轻的小伙子，从他们那里汲取所谓的爱情，要填满自己情感的空穴；深层次看，姑妈牺牲了年轻时的美貌和容颜资本，却没能按照自己的“盘算”来生活，目的没能得逞，在心灵归属上具有巨大的空缺。

3. 睇睇和睨儿的焦虑：替代焦虑到僭越焦虑

作为这一家的女佣人，睇睇和睨儿又代表了女主人客厅里的一类角色，她们虽然是姑妈梁太太雇佣的服侍她起居的人，但是在本质属性上和薇龙没有不同，她们都是姑妈的“棋子”。睇睇和睨儿的焦虑源于不切实际的幻想，然而在那样一个客厅里，保持理性非常困难。“棋子”害怕被替代，因此凡事小心翼翼，看眼色、看脸色是她们的看家功夫，揣摩主人心思、领会主人意图是她们的必备本领。可是端着“小心”在危险里行走，恰恰给了她们僭越的欲望，蠢蠢欲动的寻找是她们那个阶层里的焦虑，她们企图用危险的僭越颠覆人生，改变命运。

（二）女性焦虑意识在故事里的沉浸：反复和回旋

女性焦虑意识在故事里主要通过三种手段来展现，一是讲述人的焦虑感营造，既是全能视角也是掌控视角；二是故事人物的焦虑心理描写；三是故事人物的对话开展。三种手段相辅相成，造成了女性焦虑意识在故事里的矛盾、反复和回旋。

1. 讲述人的焦虑感营造

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听我说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您这一炉沉香屑点完了，我的故事也该讲完了……

这一段香港故事，就在这里结束……薇龙的一炉香，也就快烧完了……

这是这篇小说首尾的两段，以“第一炉香”互相呼应，讲述人好像是一个娓娓道来的说书人，然而他要说的故事却是只在一炉香的时间段内，所以这种时间上的紧迫感已经给读者一个扑面而来的焦虑感了，无形的焦虑已经笼罩在读者心头。

……这里不单是色彩的强烈对照给予观者一种眩晕的不真实的感觉——处处都是对照；各种不调和的地方背景，时代气氛，全是硬生生地给掺揉在一起，造成一种奇幻的境界。

葛薇龙在玻璃门里瞥见她自己的影子——她自身也是殖民地所特有的东方色彩的一部分……

讲述人只是“客观”地描写着姑妈家的环境，却已经让主角和读者感受到了双重窘迫。本来是美不胜收的场景，讲述人非要刻薄地说“处处都是对照”。为什么呢？因为主角葛薇龙感觉到了自己是那个尴尬的部分，是存在焦虑的部分，她害怕，害怕自己格格不入、充满滑稽感，成为那“对照”的一部分。

葛薇龙的焦虑处境在一堆碧色琉璃瓦、中国屏风、英国玫瑰、美国圆柱的映照中，清晰地呈现在读者眼中。“张爱玲小说中有些‘道具’——如屏风、旧照片、胡琴、镜子——都具有新旧重叠的反讽意义：它从现代的时间感中隔离出来，又使人从现代追溯回去，但又无法完全追溯得到”。

2. 心理活动的焦虑感代入

故事里有大量的主角的心理活动，张爱玲用意识流的写法将主角葛薇龙的心思所想表达出来，心理活动既是葛薇龙的焦虑反复回旋的过程，也是她命运滑坡的过程，读者读懂了她的一步一步焦虑，也就读懂了她的一步一步退让，更读懂了她的自我麻醉。试看薇龙面对衣橱的心理活动，不过三个月，前后心理已经发生很大变化。

薇龙连忙把身上的一件晚餐服剥了下来，向床上一抛，人也就膝盖一软，在床上坐下了，脸上一阵一阵的发热，低声道：“这跟长三堂子里买进一个讨人，有什么分别？”

.....

薇龙这一开壁橱，不由得回忆到今年春天，她初来的那天晚上，她背了人试穿新衣服，那时候的紧张的情绪。……薇龙叹了一口气；三个月的工夫，她对于这里的生活已经上了瘾了。……薇龙不愿意自己有一天变成这么一个人(姑妈)。

刚到姑妈家里，看到姑妈给自己准备的“魔法”衣橱，薇龙是很紧张的，但又挡不住虚荣，于是在类似长三堂子“讨人”的焦虑中，薇龙开启了自己的交际生活。同样的场景，同样是焦虑，薇龙已经完成了质的转变。这样的心理活动在故事里还有很多，而面对衣橱的这一幕显现出了焦虑意识的发展进化的效果。

3. 人物对话的焦虑感生发

如果说心理活动是故事人物焦虑的向内展现，那么人物对话就是人物焦虑意识的外化。对话中的语言、情绪、动作，往往都受到焦虑的潜在影响，使得语言的韵味和节奏在焦虑中爆发。

试举一例，薇龙和梁太太在薇龙发现乔琪乔和睨儿的事之后有一场颇为深刻的对话：

梁太太站了起来，把两只手按在她肩膀上，眼睛直看到她眼睛里去，道：“你来的时候是一个人。你现在又是一个人。你变了，你的家也要跟着变。要想回到原来的环境里，只怕回不去了。”

薇龙道：“我知道我变了。从前的我，我就不大喜欢；现在的我，我更不喜欢。我回去，愿意做一个新的人。”

简单数语，却句句戳心，对话的最后，围绕一个“变”字，变与不变，永远是焦虑的溯源所在，凉薄的对话，生发出无边的焦虑感，一种不确定性弥漫在故事人物中，也弥漫到读者心里。

（三）女性焦虑意识在现代性场域中的表达：反映和期待

《沉香屑·第一炉香》的故事设定是在战前的香港，20世纪40年代，香港的现代化程

度已经较为发达，特殊的地理位置、政治位置使得香港成为一个琳琅满目、鱼龙混杂的地方。

“铺张旷男怨女，夙夕悲欢，演义堕落与繁华，荒凉与颓废，毕竟得有城市做衬景，才能写得有声有色”。

时代给予了香港一个特别的空间，城市空间是历史、政治、文化、社会共同构成的一个现代性场域。《沉香屑·第一炉香》是张爱玲香港书写系列的第一部，女性焦虑意识的表达，处在香港这个特殊场域中，显得更有现代性意义。“她并没有完全把现代和传统对立(这是五四的意识形态)，而仍然把传统‘现代化’——这是一个极复杂的艺术过程。因为她所用的是一个中国旧戏台的搭法，却又把它作现代反讽式的处理”。

1. 一种反映

世界形势的动荡、香港的现代教育、姑妈家的繁华生活，对于葛薇龙来说，都是一种现代性启蒙。“在张爱玲的小说中，香港承受着双重注视：来自英国殖民者的和来自中国上海人的”。时代解体背景下，葛薇龙也渴望真实而安稳的人生，然而背后的蓝色大海的飘摇却是一种不确定的象征。张爱玲不写大时代，只写姑妈家的客厅，尖刻地描绘出各种俗世人等的焦虑。一众座上宾，每个人呈现出来的为人处世的算计都是一种焦虑的反映。

这是一个爱情故事，这更是一个焦虑利益链。姑妈梁太太从青春年少到半老徐娘的历史也是社会从传统到现代过渡的历史，侄女的突然出现像是作为一种映证，表面是重蹈姑妈覆辙，其实也是一种迂回的前进。时代的坐标在姑妈的客厅里被标记：

她看她姑母是个有本领的女人，一手挽住了时代的巨轮，在她自己的小天地里，留住了满清末年的淫逸空气，关起门来做小型慈禧太后。

2. 一种期待

焦虑是对未来没有发生的事的不安，既是没有发生的，那么也就可以有期待，焦虑和期待是一对双生词，不确定性和可能性是一对双生词。张爱玲在《沉香屑·第一炉香》里展现的焦虑也都是与期待共生的。“我写作的题材是这么一个时代，我以为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是比较适宜的。我用这手法描写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下来的记忆，而以此给予周围的现实一个启示”。

很多评论不约而同地将故事的主题定为葛薇龙的“沉沦”，似乎沉沦和觉醒是女性解放永久的主题。大家都在期待，期待受到“启蒙”的女性，下一步往何处去。薇龙自己也是期待着的，尽管这期待只是带着疑似爱情的面目出现，尽管这期待有时并不如她所愿。很多读者期待女主角能有一个“觉醒”的未来，然而现实残酷只会让薇龙做出小说里的选择。故事在第一炉香烧尽的时候戛然而止，但是薇龙的人生却还很漫长，能否超越姑妈的命运，重新掌控自己的人生，也未为可知。不管怎么说，现代性还是给女性人生提供了一种选择的可能性，一种期待。

什么是沉香？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常绿乔木，叶子卵形或披针形，花白色。木材质地坚硬而重，黄色，有香气，可入药。”“沉香”也大可以比喻故事里的女性，看似柔弱，无法掌控命运，然而她的质地又何尝不像沉香那样，久久令人回味。“‘沉香’的另一个寓意，就是‘沉没的香江’，‘沉香屑’就是星沉海底的香港的一点余烬”。

氤氲的烟气，似乎把读者带回 20 世纪 40 年代，带回一个清晰的“堕落”的过程，但是也会把读者带回现实，切割故事和人生。一炉香的时间，合上书页，是合上焦虑。然而，合

上书页的时刻，现实焦虑迎面而来。

《沉香屑·第一炉香》注定是个传奇，当我们看到张爱玲在淡定地书写的时候，也许她只是在抵抗自己的焦虑，用这样一种讽刺和惋惜的形式，填平自己焦虑的沟壑。她在一次又一次的焦虑到来之时，用文字平息紧张和不安，然后等待焦虑的再一次冲击。某种程度上说，焦虑似乎是张爱玲好作品的催化剂和魔幻药。焦虑感的释放，是灵魂不断地冲破肉身，要说话。张爱玲把这些话写出来，就是最好的故事。

十二.《沉香屑·第一炉香》精神分析视域下的解读

《沉香屑·第一炉香》是张爱玲的处女作，于1943年发表于《紫罗兰》创刊号。该小说发表后引起了上海文坛的关注，尤其是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周瘦鹃更是盛赞这篇小说是“一种特殊情调的作品”。它叙述的是“霉绿斑斑”的香港洋场生活，来自上海的女学生葛薇龙来到香港求学，因家庭无力供养而选择投靠富豪遗孀——姑妈梁太太。寄居在姑妈家的这段时间，葛薇龙这样一个单纯天真的少女逐渐陷入香港社会的金迷纸醉中。她被姑妈梁太太当作利诱男人、攫取利益的诱饵，游离于几个男人之间，成了香港上流社会的交际花。虽然几欲脱身，但最后却爱上了浪荡不羁的花花公子乔琪乔。从不经世事到沦为妓女，从物质到精神的沦陷，葛薇龙的命运无疑是悲剧的。她的悲剧命运更多的是源于人格结构中本我、自我与超我的失衡，当本我以压倒性的态势战胜自我时，她的行为不再受到“自我”的约束与管控，便使其陷入追寻本能冲动的欲望中来。从而丧失了对于现实社会的理性判断，最终导致了葛薇龙的悲剧性命运。

（一）初入社会：“本我”的躁动与“自我”的坚守

在弗洛伊德的三部人格说中，本我是潜意识下的思想，由先天的本能、原始的欲望所组成的。而自我是人格中最理智的、符合现实的部分，它派生于本我，不能脱离本我而单独存在。它源于现实性需求，代表着理性和常识，与含有情欲的本我形成鲜明对照。对于本我和自我的关系，弗洛伊德有这样一个比喻：本我是马，自我是马车夫。马是驱动力，马车夫给马指方向。自我要驾驭本我，但马可能不听话，二者就会僵持不下，直到一方屈服。

小说开篇作者用带有古中国情调的语言来描绘梁太太的宅邸，英伦之风与中国传统风情相结合的府邸是葛薇龙迈入香港社会的起点，这也就注定了她的一生与这座富有传奇色彩的宅子紧密相连。葛薇龙选择投靠姑妈的动机源于生存本能的需要，即弗洛伊德所说的“接纳本能要求，使其得到满足”。潜意识中对于能够在香港生存下来的渴望是葛薇龙物欲沉沦的前提，即使在一开始便已经知道这是一个鬼气森森的世界，但是本我中的潜意识使确信自己可以抵御利诱。现实是残酷的，当她真正地踏进这座深宅大院后，一切都已注定了。小说中除了对葛薇龙显性的心理描写之外，还大量潜藏着隐性的心理活动。这些都是通过对于环境和意象的描写传达出来的，例如以葛薇龙视角所叙述的梁太太豪宅内植物，“宝蓝瓷盘里一颗仙人掌，正是含苞欲放，那苍绿的厚叶子，四下里躺着头，像一窠青蛇，那枝头的一捻红，便像吐出的蛇信子。”“蛇信子”是危险的象征，它预示着这座美丽的豪宅极具危险性，一旦踏入，便会陷入无法自拔的境地。而促成这一切是其姑妈梁太太，因贪求物质享受嫁给了富商做姨太太。年老色衰后在香港站稳了脚跟，在自己的宅院里关起门做慈禧太后，收割着年轻人的爱欲，她需要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孩为自己笼络上流社会的交际关系，葛薇龙自然就成了她操纵的傀儡。单纯的女孩却认为自己有能力跳出这个被鬼气所笼罩的世界，殊不知罪恶

的魔爪早已盘踞在四周。在《蓝色多瑙河》的悠长旋律中，葛薇龙恍惚地在房里试着一件又一件精美绝伦的衣服，情不自禁地跳起了舞来。本我的躁动让葛薇龙沉浸于华衣美梦中，这一袭华衣留住了女孩天性中对瑰丽的向往，然而自我的调节机制及时将其拉回至现实中来。她先后说了两次“看看也好”，自我与本我处于抗争之中。现实必要性触发了自我，压制了葛薇龙内心追逐奢靡的欲望。

姑妈梁太太在这之中充当了激发葛薇龙内心物欲的推手，在一次次的引诱之中不断侵蚀着女孩的心理防线，即“自我”。为了证明自己倾注在小妮子身上的精力没有白花，一次次把葛薇龙带入上流社会的交际圈中，特地将她引荐给自己的老情人司徒协。在葛薇龙感叹司徒协送给梁太太的手镯时，他给葛薇龙也戴上了镯子。那是一只金刚石镯子。面对物质的诱惑，葛薇龙内心的自我迅速做出反应，“她急了，便使劲去抹那镯子，想把它硬褪下来”。这一幕也是别有深意，手镯如镣铐一般，戴上镣铐就代表她要就此被永远拘禁在那肮脏复杂的世界当中，任由那个荒谬的世界在一点点地将她腐蚀。少女心中最后的防线在抵御着这个黑暗世界的侵蚀，在这一场与本我物欲的搏斗之中，自我以极其微弱的优势压制了本我。在面对物质诱惑时，葛薇龙潜意识心理所表现出的抗拒与挣扎是自我机制抵御本我的结果。

（二）情欲追寻：“自我”的放纵与“超我”的克制

与自我不同，超我是个体在成长过程中通过内化道德规范、内化社会及文化环境的价值观念而形成。它总是与享乐主义的本我直接对立和冲突，以道德良心或者无意识负罪感的形式更加严苛地监督着自我。

如果说对于物质世界的诱惑，葛薇龙尚存有抵抗之心。当情感的浪潮来袭时，她便束手无策了。精神世界的荒芜是葛薇龙情欲追求的动因，当物质需求可以轻易得到满足时，内心的空虚与寂寞便显现出来。乔琪乔的出现如同一道光，给这个迷茫困顿的少女带来希望。他将高超的调情技巧在葛薇龙身上运用得淋漓尽致，挑逗的话语和风趣的外貌使葛薇龙很快丧失了应有的判断力。当面对爱和欲的抉择时，自我的矛盾与挣扎带来的是情欲的放纵与沉沦。葛薇龙对于情欲的热衷正如弗洛伊德所描述的那样，“自我本能也是以追求快乐和满足为目的”。这场荒谬的爱恋从一开始就是不公平的，葛薇龙在乔琪乔编织的爱欲中一步步沉沦，而乔琪乔却时刻保持清醒，他可以给葛薇龙任何东西，但是除了婚姻和忠诚。他在这场爱情的游戏中，始终处于睥睨的高点。对于爱情本身并不关，他所想要得到的对于女人的征服，从而获得一种精神上的胜利感。他清楚地明白谁是猎人，谁是猎物。逢场佳人，露水情缘，爱憎几何，自己仍是清清冽冽，放荡洒脱。拜伦说：“男人的爱情是与男人的生命不同的东西，女人的爱情却是女人的整个生存。”她何尝不知乔琪乔的浪子本性，但是仍将自己的命运寄托在这样一个放荡不羁的公子哥身上，浪漫天真的葛薇龙以为爱情可以感化乔琪乔，便以出卖身体为代价追寻情欲。在冷酷无情的乔琪乔面前，葛薇龙的自我意识以一种卑微的姿态臣服于爱欲。这导致她既无法拒绝乔琪乔带给与她的性欲上的快乐，更无法抗拒自身内部野蛮的热情，她只能清醒地看着自己走向欲望的深渊。“在本我需要所引起的紧张背后存在着着力，它便被称为本能。本能体现着作用于心灵的肉体欲求”。弗洛伊德认为人的精神活动的能量来源于本能，本能是推动个体行为的内在动力。而性本能是一种原欲、一种力量，这种力量裹挟着葛薇龙走向沉沦。伴随着性欲高潮落幕的是葛薇龙内心超我的觉醒，促使她进行道德伦理层面的反思。她清楚地认识到自己与乔琪乔畸形的爱情，不仅是因为乔琪乔的吸

引力，更多的是自己对于爱欲的需求。而幻想中的爱情在超我视角的下也显得苍白无力，乔琪乔想要从她身上获得的只是性欲上的享受，他将这种极端的爱欲理念灌注于葛薇龙身上。对于上流社会的龌龊体面，他看得清醒异常，活得恣意沉沦，颓废到骨子里又发出光来，属于精神层面天长地久的东西，他从来都不曾拥有过。超我是抑制本能冲动的，所以内在或多或少会因欲望得不到满足而感到痛苦。葛薇龙的堕落从本质上来说，是因为超我在与本我的斗争中居于下风，道德化的自我在本我的欲望面前被迅速瓦解，使得个体为本能所驱使。短暂的清醒很快被物欲和情欲所压制，葛薇龙被这一夜的欢愉所禁锢着。她不断暗示自己，“梁太太、司徒协其他一群虎视眈眈的人，随他们爱怎么就怎么吧。”当性欲本能超越本身道德约束时，为了消解“超我”所带来的焦虑与痛苦时，心理防御机制在不知不觉中以某一形式来调整两者的关系。葛薇龙以不断的心理暗示有意或无意地拒绝承认那些不愉快的现实，曾经对于爱情极度缺乏安全感的葛薇龙，企图用婚姻的枷锁来束缚乔琪乔。为了爱而结婚，等同于拒绝了现实，等装在坛子里的喜欢着的云慢慢化成水，留下的只有一场落空。

然而这种快乐是短暂的，幻想中的爱恋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是那么不堪一击。就在同一夜，乔琪乔从性欲的快感中清醒之后，立刻转身拥向婢女睨儿。葛薇龙在亲眼看见这场荒唐的偷情之后，强烈的精神刺激触发了自我保护机制。她做出了离开香港的决定，自我的清醒驱逐了隐匿在内心的臆想。面对姑妈梁太太的百般利诱，她非常清楚自己来到香港之后的变化，但是仍然坚持愿意重新做一个新人。遵循超我的道德和理想原则，葛薇龙的心理斗争是本我、自我、超我三者相互制衡的结果，做出理智的决定是自我与超我对抗本我的胜利。然而最终导致葛薇龙走向罪恶深渊的是自我意识的薄弱，面对乔琪乔的强烈攻势，自我开始动摇。“她生这场病，也许一半是自愿的；也许她下意识地不肯回去。”当她再一次考量自己的决定时，物质和欲望已经彻底将其腐蚀。“走”与“不走”两个念头在葛薇龙心中反复斗争着，乔琪乔的出现将自我和超我中的道德、逻辑、现实都彻底击溃，在快乐原则的支配下，满目追求满足。即使明白眼前的物欲和情欲不过是海市蜃楼，本我的原欲所转化的精神力量再一次将葛薇龙拖进黑暗的深渊。“在暮色苍茫中，一路上高高下下开着碗口大的红花。”对比后面乔琪乔追上来时的景色描写，“天完全黑了……真正存在的只有一朵一朵挺大的象牙红，简单的，原始的，碗口大，桶口大。”红花是喜阳的植物，生长期需充足阳光。在灰暗的暮色中，红花仍顽强地怒放着。而红花则映射出葛薇龙心理斗争的结果：即使外界如此黑暗，仍要像红花一样顽强地绽放。现实的残酷就在于葛薇龙总是不肯放弃，总想去抓住什么，最后开出了悲情的花。对于乔琪乔的爱欲是促使葛薇龙走向深渊的巨大推力，她对于可预见性的悲剧，有一种兵来将挡的盲目乐观。对乔琪乔投入了对美好生活的全部幻想，一旦陷入便是万丈深渊，得到的只是深渊中抓不住的旁人的手。

（三）走向毁灭：“自我”的沉沦

在梁太太与乔琪乔的精心安排之下，葛薇龙嫁给了自己曾经排斥的物质化的爱情，或许不能将其称为爱情，不过是一场上流社会的金钱交易。这场交易对于梁太太来说，得到了入赘的侄女婿，更是搭建起了与乔家的利益关系。最根本的还是彻底掌控住了葛薇龙，利用葛薇龙来笼络上流社会的人，编织着自己的利益网。对于乔琪乔来说，这同样是一场稳赚不赔的交易，他得到了上门入赘的机会，摆脱了原生家庭的束缚，更是洗脱了杂种背后的罪恶。而这场交易的主角葛薇龙得到了物欲和情欲的双重满足，那颗畏缩不安的心能够得到暂时的

休息。自我的沉沦使其不再执着于未来，只在乎眼下的欢愉。葛薇龙的悲剧源于想要拥有全部，自我的沉沦使其无法从物欲和爱欲的深渊中解救出来。在这场爱恋中，葛薇龙始终把自己摆在卑微的位置，自我的满足感因乔琪乔而不断变化着。整篇小说的结尾是引人深思的，当她看到被几个水兵挟持的女子浪荡在大街上的时候，她说：“我跟他们有什么分别？”“她们是不得已，我是自愿的。”异常清醒的她已身处无边的黑暗之中，对于物欲和爱欲的本能追求使其无力挣脱，只由得自己在梁太太和乔琪乔的掌股之中继续沉沦。葛薇龙宁愿沦落为高级交际花也想要得到的爱，正称了那句广为流传的话：“喜欢一个人会卑微到尘埃里，然后开出花来。”葛薇龙以自身献礼，在别人不值得的罪孽上，撞破头也成不了桃花扇，只是沾上了时代的旧袍上两点腥腻的血沫子而已。在沉香的缕缕细烟中，葛薇龙的故事落下了帷幕。“火光一亮，在那凛冽的寒夜里，他的嘴上仿佛开了一朵橙红色的花，花立时谢了，又是寒冷与黑暗……”橙色的花包裹着葛薇龙的全部幻想，她以为自己抓住了幸福，不过是醉生梦死一场，最终走向寒冷与黑暗。如果这场悲剧与沉沦有关，那么这是一场太过清醒的沉沦。

纵观葛薇龙的悲剧人生，除了来自梁太太和乔琪乔的利诱，更多源于自身人格结构的不稳定性。面对梁太太的物质诱惑，自我尚且可以驾驭本我，从而使其可以理性地掌控人生的方向。一旦将其性本能激发，本我就会急于与现实世界发生交互作用，将性欲渴望通过自我表现出来。当超我站道德制高点进行心理调节时，葛薇龙因无法忍受精神的痛苦而启动防御机制来获得满足。究其根本，葛薇龙的悲剧是其探寻本我意识的终结，她通过自我沉沦的方式来获得本我的解脱。葛薇龙的故事是隐匿于人性中的噩梦，每个人心中都有本我的存在，它受制于自我和超我的束缚。张爱玲笔下的女子，无论是曹七巧、吴翠远还是葛薇龙，她们的故事都不过是时代浪潮中的一粒灰尘。在社会的大环境下，她们都只是一个平凡人，在多半的命途中只负责演绎自己的人生。她们的堕落与消失都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甚至连一点同情都得不到。但是她们都以自己的方式走完悲惨的一生，在不值得的岁月里留下了自己独一无二的痕迹。她们以一种强烈的女性觉醒意识去挑战男权社会下森严的伦理秩序，她们的行为犹如在旧社会划开一道口子，将外界的光亮投射进这个黑暗污浊的社会。葛薇龙爱欲的沉沦逃不开时代的禁锢，她的故事最终以悲剧式结局落下帷幕。

张爱玲以其荒凉、凄冷的笔调来描摹近代社会中人性与物欲的冲突，以非理性的物欲和情欲来解释葛薇龙的悲剧人生，道出了肮脏复杂的人性与现实。同时也给我们一个忠告：在物欲横流的大千世界中，莫让物欲裹挟着自己走向深渊。要守住清醒冷静的心，选择适合的生活方式，寻觅对的人，如此才能不负人生。

十三.《沉香屑·第一炉香》具有“悲”色彩的比喻句

亚里士多德说“比喻是天才的标识”。张爱玲小说中的比喻句别具一格、极具创造性和表现力，不愧是“天才女作家”。《沉香屑·第一炉香》之所以能成为张爱玲的成名作，除去其他因素，比喻的恰当使用也是必不可少的原因。在小说中，具有“悲”色彩的比喻句分别营造了阴森恐怖、悲凉失望，甚至毁灭死亡的氛围，对于小说刻画人物悲伤的心理、暗示命运悲惨的走向、表达主题悲凉的思想意识功不可没。根据在文中其所起的作用，将《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出现的具有“悲”色彩的比喻句进行归类分析。

（一）具有“悲伤”色彩的比喻句：营造阴凉黑暗的环境、表现人物悲伤的心境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写到薇龙对服装面料的感觉，内心的感觉本是抽象而微妙的，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作者却连用三个比喻，毛织品是曲调悠扬潇洒的爵士舞、丝绒是大气高亢的歌剧主题曲、软缎是流畅宛转的《蓝色多瑙河》。她本保留了那份平淡、进取之心，想要继续完成学业并在学业上有所成就，但是眼前姑妈为她准备的这些奢华的衣服把她继续学习的愿望打消了。她的内心由平静到骚动，挑拨、忧郁、凉阴这三个词传神地写出了薇龙此时享受这一切但又怕深陷其中难以自拔的伤感、矛盾心理。

其实薇龙即将入住梁家时心情忐忑不安，既渴望又害怕。张爱玲用精妙的语言描述了冰块在薄荷酒里慢慢融化的细节，颜色、形状、变化的过程与灯光在绿玻璃窗里的晃动极其相似、视觉上异常契合。这个比喻在这里营造了一种阴森、恐怖的气氛，使人感觉到溢出画面的浓郁的紧张感暗示出她即将踏入表面奢华实则危险的境地。当薇龙住进梁家之后，张爱玲把阳台比作甲板，把窗外浓郁的雾气比作一片海，把薇龙如雾般迷茫、没有头绪、看不到前景的伤感心情表达得含蓄而精准。

在薇龙面对乔琪背叛时也有过同样矛盾的心理，薇龙一边想躲回上海的家逃避这一切，一边又放不下香港的奢华享乐的生活。心魔难去，心痛难医。这里描写冷冷的白色天空像刀子一般割痛了眼睛，高飞的黑鸟惨叫一声像在刀口上刮了一刮似的，作者用通感将自然景物用人的感觉表达出来，富有创造性地写出了薇龙悲伤痛苦凄凉的心情。

（二）具有“悲惨”色彩的比喻句：烘托阴森恐怖的气氛、暗示人物悲惨的命运

作者用梁夫人出场时的服饰和颜色暗示了她的身份和处境。梁太太穿着时尚的黑色服装，戴着绿色面网，绿宝石在网面上忽明忽暗，显得神秘而性感。黑绿搭配，神秘又性感；绿宝石代表她的富贵；面网代表她遮遮掩掩的龌龊生活；黑蜘蛛代表阴险和毒辣、把薇龙黏进她亲手编织的网里；欲坠未坠、明亮的泪珠代表她年老色衰无依无靠还得浓妆艳抹卖笑的悲惨命运；暗暗的一粒青痣，代表她贵妇身份掩盖下真实的“鸨母”身份。

如果说梁太太贵气的装扮含蕴丰富的话，司徒协给薇龙戴金刚石镯子的描写也是耐人寻味。作者通过司徒协给薇龙戴镯子的细节描写，让读者从司徒协动作的迅疾上可以看出他迫不及待、猴急的龌龊心理。如果薇龙被戴上这只镯子，就意味着拿人手短、身不由己。所以就像犯人被抓给套上了镣铐。这个事件也促使薇龙开始考虑选择乔琪，一方面指薇龙还处在懵懂当中就被别人利用；另一方面隐喻薇龙被梁太太和觊觎她的人下了套，套上了沉重的枷锁。

薇龙的这种悲惨命运，作者早在薇龙刚来到梁太太家时，就用梁太太家的植物盆景做了暗示。先是将仙人掌苍绿的厚叶子拟人化，写其因长得茂盛而“四下里探着头”给人张牙舞爪、危险逼人的感觉；接着又将厚叶子模拟成扭动的青蛇，瞬间让读者感到仿佛置身于恐怖、阴森的氛围之中、危险逼人；又将含苞欲放的花朵比作青蛇吐出的红信子，狰狞吃人的形象加重了阴森恐怖、危机四伏的气氛，生动形象地衬托出了薇龙在这种环境里紧张、惶恐、害怕的心情。正巧此时梁太太的丫鬟睨儿从花背后帘幕里出来，一下子使人联想到是青蛇朝薇龙这边游过来，把薇龙吓得“打了个寒噤”。

除了把植物和动物联系起来，作者还把照在人身上的阳光比作凶残的猛兽。那阳光透过扇子筛入到嘴里，振振欲飞。恍惚之间，让人产生一种幻觉，以为是根根老虎须在颤动。这一比喻暗示梁太太是这个家的“慈禧太后”难伺候，那么自然让人联想到薇龙投靠梁太太后

的日子应该是不好过。

“慈禧太后”十分重视呵护装扮她的手指头。“梁太太正擦完蔻丹，尖尖的翘着两只手，等它干”。雪白的手指，十指尖尖，涂抹那一点鲜红，红白映衬，本是十分美丽的画面，然而在这里十个红指尖就像滴着鲜血，这个血腥场面让人惨不忍睹。

（三）具有“悲凉”色彩的比喻句：渲染毁灭死亡的气息、传达人物悲凉的意识

《沉香屑·第一炉香》题目就用了比喻。初读不懂题目为什么这样选取，读懂后发现才它的妙处。“您这一炉沉香屑点完了，我的故事也该完了”。讲的是故事的开始与结束，同时也讲的是薇龙人生的开始与归宿；似乎在说，人的一生就像一炷香燃尽的过程，短暂而虚无，不过如此。

正因为张爱玲的这种悲凉意识，小说中处处有危险、时时有冲突，把本应美好的场面写得充满“杀气”。周吉婕的美貌在张爱玲的笔下充满杀气，像恐怖的女鬼一般：脸雪白，眼睛泛着淡绿的光，鬼阴阴的；稀疏的睫毛和眉峰黑得厚重；厚嘴唇是猩红的——简直是一种女鬼版肃杀的“美”。

薇龙不仅看周吉婕有肃杀之气，姑妈的家在她的眼中也是皇陵一般的存在，窗棂上是红色、黄色搭配，琉璃瓦和玻璃窗是绿的，房子是白的。黄、红、绿、蓝、白，都是饱和度很强的色彩，搭配在一起的时候，风格像皇陵，暗指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下浓厚的封建阴影，这种阴影是导致薇龙走向堕落的很重要的原因；也暗暗交代了姑妈家就是一个埋葬青春的坟墓。

“薇龙觉得自己是《聊斋志异》里的书生，上山去探亲出来之后，转眼间那贵家宅第已经化成一堆大坟山”。这比喻的想象力和渲染力，让人感到惊心动魄。

姑妈家阳台对面的山崖伸出舌头“舔舐”，而阳台上的植物也是杀气腾腾，用夸张的手法写出微风里都是血腥味儿。“吃人”的气息弥漫在薇龙的周围，“杀气腾腾”暗示薇龙迟早会被这些外力所吞没。

陈妈本是陪薇龙入住梁家的佣人，作者对陈妈的描写也是充满杀气，薇龙觉得陈妈的那根辫子“扎得杀气腾腾，像武侠小说里的九节钢鞭”。这样的辫子，那一定是生硬、呆板、老土，上不得台面。这个细节描写从侧面反映出薇龙内心既清高又自卑、虚荣的矛盾性。这为下文薇龙既享受姑妈家的生活又还看不起、深深厌恶这种生活的矛盾心理埋下了伏笔。

薇龙跟乔琪赌气时内心无比失望痛苦，看到的世界也像是吃人的血盆大口：黑夜里的一朵朵象牙红，简单、原始、碗口大、桶口大。作者用常见的外在事物形象烘托出恐怖感，让人联想到了恐怖剧中飘忽在黑夜当中的红衣女鬼，十分诡异。

所以，他们结婚以后的结局，小说的结尾有这样一段描写：黑夜中，乔琪打火机打出的火光仿佛一朵橙红色的光，可是转瞬就消失了，仍是无尽的寒冷与黑暗。薇龙的爱情、幸福和欢乐像这火花瞬息间消失殆尽，生活“仍是无尽的寒冷与黑暗”。

张爱玲以她非凡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用一系列的生动比喻烘托氛围、表现心理，突出主题。氛围的阴森恐怖、心理的悲伤失望，无不飞扬着作者的悲凉意识：这里的人们只有“不明不白、猥琐、难堪、失面子的屈服。然而到底是凄凉的”。

十四.《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看”与“被看”

张爱玲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讲述了一位上海的女中学生葛薇龙为继续留港读书从而投靠有钱有势却名声败坏的姑母梁太太，在纸醉金迷的生活中一步步变成交际花，继而爱

上风流浪子乔琪乔，最终与其结婚并沦为妓女的故事。张爱玲在这篇小说中细致入微地刻画了众多形象鲜明的人物，其刻画人物的方式通常并非作者直接横空跳出来进行陈述，而是藉由人与人之间相互的“看”与“被看”展示。人物形象不仅在“看”与“被看”中变得更加立体和丰满，同时在“看”与“被看”之中巧妙地显露彼此之间微妙的关系。不仅如此，由于《沉香屑·第一炉香》的故事发生在香港这一东西文明交融混杂的特殊土壤上，人物的“看”与“被看”便不仅仅是个体之间的“看”与“被看”，还折射出各自所代表的文化和文明之间的“看”与“被看”。除此之外，恋爱与婚姻作为张爱玲早期文章中的重要主题，对两性关系乃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理解亦可以透过“看”与“被看”的视角进行更深入的解读，从而挖掘出更深刻的价值。

（一）东方与西方之间的“看”与“被看”

《沉香屑·第一炉香》写于香港处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小说以香港为背景，将一座宏观的城市浓缩到一座梁宅里，以小见大地展现英国统治之下香港整体的文化气质。小说中有大量关于“不调和的地方背景，时代气氛”的描写，读者藉由主人公葛薇龙的眼睛“看”到两种文明被“硬生生地给搀揉在一起”时所造成的“奇幻的境界”。例如葛薇龙初次上山见到梁邸时：

山腰里这座白房子是流线型的，几何图案式的构造，类似最摩登的电影院。然而屋顶上却盖了一层仿古的碧色琉璃瓦。玻璃窗也是绿的，配上鸡油黄嵌一道窄红边的框。窗上安着雕花铁栅栏，喷上鸡油黄的漆。屋子四周绕着宽绰的走廊，当地铺着红砖，支着巍峨的两三丈高一排白石圆柱，那却是美国南部早期建筑的遗风。

“仿古的碧色琉璃瓦”“红砖”是中国南方传统的建筑风格。香港位于中国南部，处于亚热带季风气候，“琉璃瓦”和“红砖”的结构有利于通风防潮，然而梁邸在中国传统特色的建筑风格中生硬地加入了具有美国南部早期建筑风格的“白石圆柱”，可见中西文明在香港这片土壤上的交杂混融。除此之外，梁邸内部的布置也显示着中西文明的对照：

从走廊上的玻璃门里进去是客室，里面是立体化的西式布置，但是也有几件雅俗共赏的中国摆设，炉台上陈列着翡翠鼻烟壶与象牙观音像，沙发前围着斑竹小屏风……

“西式布置”搭配上“中国摆设”，使得整体布置显得荒诞可笑。然而这些不协调的原因，并非因为房子主人缺乏审美趣味，毕竟连学生葛薇龙都察觉到风格的不协调，却是为了“看在外国朋友们的面上”，因为“英国人老远的来看看中国，不能不给点中国给他们瞧瞧”。从这里可以窥见在英国殖民统治之下东方文明所处的“被看”地位。在“被看”之位上有一部分人是清醒着的一葛薇龙从玻璃中看自己影子的情节可以看作东方文明的自我审视：葛薇龙在玻璃门里瞥见她自己的影子——她自身也是殖民地所特有的东方色彩的一部分，她穿着南英中学的别致的制服，翠蓝竹布衫，长齐膝盖，下面是窄窄的裤脚管，还是满清末年的款式；把女学生打扮得像赛金花模样，那也是香港当局取悦于欧美游客的种种设施之一。

葛薇龙作为一个从传统中国家庭走出来的女性，其所代表的东方文明在“看”自己的同时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被看”的地位。然而可悲的是，即便如此，她也只能和其他的女孩“在竹布衫外面加上一件绒线背心，短背心底下露出一大截衫子”，却显得更加“非驴非马”，无法从根本上挣脱在西方文明的审视之下“荒诞，精巧，滑稽”的自己。

（二）女人与女人之间的“看”与“被看”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刻画了众多的女性人物，女人与女人在相互“看”与“被看”的过程中丰富自身形象，同时展示出同性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在同性之间的“看”与“被看”中，梁太太和葛薇龙的“看”与“被看”十分典型，尤其在这段：薇龙答应着。梁太太手里使刀切着冷牛舌头，只管对着那牛舌头微笑。过了一会，她拿起水杯来喝水，又对着那玻璃杯怔怔的发笑。伸手去拿胡椒瓶的时候，似乎又触动了某种回忆，嘴角的笑痕更深了。

这里葛薇龙在“看”梁太太，她觉得眼前的姑妈是个可怜的女人，因为“男人给了她几分好颜色看，就欢喜得这个样子！”。正当她“暗暗地叹了一口气，想道：女人真是可怜！”时，不料“被看”的梁太太立刻反过来“看”她。梁太太“一抬头瞅见了薇龙，忽然含笑问道：‘你笑什么’，薇龙狡辩‘我几时笑来？’，却从梁太太背后的奖牌中“看”见自己的脸“可不是笑微微的”。这里薇龙不仅在“被看”，同时也在“看”自己，好在梁太太只把薇龙的笑理解为“到底小孩子家，一请客，就乐得这样！”，然后继续笑吟吟地吃牛舌头。张爱玲写道“姑侄二人这一顿饭，每人无形中请了一个陪客”。其中的“陪客”，便是由“看”与“被看”所造成的彼此在对方眼中的镜像。姑侄二人在“看”与“被看”中相互猜疑、揭示、隐瞒，巧妙地体现出女人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同时也暗示着在较量中彼此身份地位的变化。

葛薇龙从一开始进入梁邸时彻底的“被看”地位（“薇龙猛然省悟到，她把那扇子挡着脸，原来是从扇子的漏缝里盯眼看她”），发展到能够“看”梁太太并且感慨“女人真是可怜”，其在梁家所处地位的上升由此可见一斑。除此之外，葛薇龙对于梁家的微妙的态度转变也可从“看”与“被看”中寻到蛛丝马迹。例如在葛薇龙初次上山时，她眼中的梁邸“很有点像古代的皇陵”，她清楚地知道自己走进的是一座坟墓，即便安慰自己“只要我行得正，立得正”就好，然而心中对“这鬼气森森的世界”不免心存畏惧。可是在第二次上山时，葛薇龙对梁家的感情就发生了微妙的转变，体现在她“看”自家仆人陈妈的时候，她眼中的陈妈：她和梁太太家的睇睇和睨儿一般的打着辫子，她那根辫子却扎得杀气腾腾，像武侠小说里的九节钢鞭。

这是她第一次将自家的仆人和梁家的仆人进行对比，对比的结果是：忽然之间觉得自己并不认识她，从来没有用客观的眼光看过她一眼——原来自己家里做熟了的佣人是这样的上不得台盘！

这里与其说葛薇龙在“看”陈妈，不如说其实是在“看”自己。她第一次对自己的出身产生了嫌恶，进而不由自主地站在梁家人的角度审视“被看”的原生家庭，生出“上不得台盘”的鄙夷和排斥。由此不难推测，葛薇龙在住进梁家的那一刻已经在情感上弃“葛”投“梁”了，这种态度转变发生得甚为微妙，或许在理智层面上连主人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

（三）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看”与“被看”

恋爱和婚姻作为张爱玲小说中重要的书写主题，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同样表现深刻。首先，梁邸本身就是一个男女交际的场所，葛薇龙住进梁邸的第一晚所遇见的派对就暗示了她即将走进两性之间相互审视的目光：

她对于银钱交易，一向是仔细的，这次打算在侄女儿身上大破悭囊，自己还拿不定主意，不知道这小妮子是否有出息，值不值得投资？这笔学费，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好在钱还没有过手，不妨趁今晚请客的机会，叫这孩子换件衣裳出来见见客。俗语道：“真金不怕火烧。”自然立见分晓。

葛薇龙是否值得投资，回答这一问题的方式是“换件衣裳出来见见客”。可见在梁邸中，一个女性的身份价值是由异性的审视所构建的，女性在“被看”中获得自己的地位与认同。这一方面表明女性在当时男权社会下处于弱势地位，却也不尽然。张爱玲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体现出了女性意识：女性在“被看”的同时也在“看”别人。例如葛薇龙“看”乔琪乔——他比周吉婕还要没血色，连嘴唇都是苍白的，和石膏像一般。

乔琪乔在张爱玲的笔下被“去势模拟书写”，也在葛薇龙的眼中被“去势模拟化”。同时，从葛薇龙看乔琪乔的过程可见，女性“看”男性的目光同样不是单纯的，女性在“看”完男性之后立刻会将眼前的男性与其他男性进行比较“和他一比，卢兆麟显得粗蠢了许多”。异性之间的关系在“看”与“被看”中夹杂着不易察觉的计算和衡量。这种计算和衡量在受中国传统教育的葛薇龙那里是在心中暗暗进行的，在混血儿周吉婕那里就被大方地开诚布公——吉婕连忙说道：“是呀！我自己也是杂种人，我就吃了这个苦。你看，我们的可能的对象全是些杂种的男孩子。中国人不行，因为我们受的外国式的教育，跟纯粹的中国人搅不来。外国人也不行！这儿的白种人哪一个不是种族观念极深的？这就是他本人肯了，他们的社会也不答应。谁娶了个东方人，这一辈子的事业就完了。这个年头儿，谁是那么个罗曼谛克的傻子？

由此可见，两性之间的“看”与“被看”根本不是出于纯粹的“爱”，而是混杂着众多其他因素：种族、肤色、教育背景、个人事业……甚至还有来自社会他者的审视。

综上所述，《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人物在自我以及他者的目光中走向各自的人生悲剧，同时构成整个“无爱”时代苍凉的底色。在“看”与“被看”的解读当中，笔者情不自禁为张爱玲对时代以及人性的洞察之深刻而惊叹。张爱玲没有将这种洞察诉诸于宏大的叙事，而是深入浅出地将其寄托于生活中的细枝末节。正如李君维所言：张爱玲非但是现实的，而且是生活的，她的文字一直走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里。

十五.《沉香屑·第一炉香》题目意义解读

《沉香屑·第一炉香》一直受到国内外读者的关注。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对“张爱玲选题目的研究”方面论文还不多见。题目是作品灵魂的体现，张爱玲为什么选择这个题目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在文本中作者只在开头和结尾提到用铜香炉烧沉香屑，作品中间部分再没提这几个字。为了弄清作者意图，首先需要搞清楚这样几个问题。

(一)关于“沉香屑”

马明博先生在《沉香屑·第一炉香》写道：沉香为众香之首，又被喻为天香。

《红楼梦》第四十三回《闲取乐偶攒金庆寿不了情暂撮土为香》中贾宝玉偷偷去祭奠沉井而死的金钏：

……宝玉方勒住马，回头问茗烟道：“这里可有卖香的？”茗烟道：“香倒有，不知是哪一样？”宝玉想道：“别的香不好，须得檀芸降三样。”……便回手从衣襟下掏出一个荷包来，摸了一摸，竟有两星沉速，心内欢喜……

两星沉速：沉香、速香，是和檀香、芸香等齐名的香，贾宝玉身上常带的是沉香和速香。从以上所引中我们得知：沉香屑是非常贵重的一种薰香，它排在檀香、芸香和降香之前，不是普通的香。香往往是在比喻女子。沉香屑在小说中隐喻薇龙等青春妙龄的女子。

(二)香炉的意义

香炉是专门烧香用的器具。《辞海》记载：

烧香之器，也作陈设之用。……今所谓香炉，皆以古人宗庙祭祀之器为之。……古时亦用以薰衣。

香炉是祭祀用的，也可以用于陈设或给衣服熏香。

小说开头关于“香炉”的描述：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家传的”指年代久远，“霉绿斑斓”的铜锈可以作证。作为古董而传家的“铜香炉”穿越了时间、空间，承载着主流话语权的思想和文化，在这里“铜香炉”是一个象征物。叙述者用“请您寻出”这个词汇，“寻”字表明这种古董在“您”家里可能不止一个，说明这是富有“家传”的人家，要找出这个

香炉来需要去某个储藏间去“寻”。这个“寻”字，表现了家藏品的丰富，表现了两个人（叙述者和假想的听众）的关系比较密切以及他们对点香说故事这个仪式的认可。香炉可以理解为“香”的归宿、“香”燃烧过程中所处的环境。

（三）烧香及其作用

马明博先生在《沉香屑·第一炉香》的篇首写道：香之十德：感格鬼神……

香可感格鬼神。张爱玲选择最好的“天香”，选择用“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来烧这香，她在举行一个仪式：叙述者和她假想的听众带着虔敬，用家传的“铜香炉”烧一炉名贵的“沉香屑”，通过这个仪式来传达一种心灵上的企望，祭祀那个时代里陨灭的灵魂。点香这个仪式应该有一套特别的程序。张爱玲在小说中没有写。但是马明博先生写出来了：

……世刚先生捧起一只古拙的瓷香炉，……他用香锤拨动炉中细软的香灰，向香炉四周轻拨，中间形成一块凹地；他打开香盒，用香勺取沉香屑，一勺一勺，放在中间凹处，撒入少许香灰，拌匀；又取半勺香屑，以火点燃，轻轻地放进炉内香地中央；他取来香锤，将炉壁四周的香灰，轻轻地围拢向燃烧的香屑，继而将他填埋起来，……

燃沉香屑时不能有烟气，淡雅的幽香在空气中缓缓传递、扩散，仿佛心灵与环境相融合的过程。张爱玲为了体现仪式的重要性，在小说的最后一段中这样写道：

这一段香港的故事就在这儿结束……薇龙的一炉香，也就要烧完了。

可见，这炉香是叙述者替故事主人公薇龙烧的，表达了对主人公青春陨灭的惋惜，是对战乱时期年轻生命“凋零”的超度，是张式情怀对乱世的悲悯。霉绿斑斓的铜香炉在薇龙的故事里代表吞噬、融化了“天香”的香港世界。燃香过程是香在香炉中的消耗，喻指主人公的青春在香港梁太太家中“死”掉。

作为古董的冰冷的铜香炉仿佛吞噬人们灵魂的旧式环境。跳不出这个环境的年轻人仿佛燃烧在这炉中的香。香味袅袅中人的青春如燃着的香一样飘散，伴随作为古董的香炉变得铜锈斑斑。薇龙为了留在繁华的香港，选择了不爱自己的男人，心里“无边的荒凉，

无边的恐怖。她的未来，也是如此——不能想，想起来也只有无边的恐怖……”

在小说中，描写环境对人灵魂的吞灭的意向很多，描写人的灵魂受物欲吸引而失去理智的地方也很多。这个环境就是所谓的“香炉”。这个香炉里有历史的时间的延续：“留住了满清末年的淫逸空气，关起门来做小型慈禧太后。”也有当下时间的显现：“梁宅前面，这条山道，是有名的恋人街。一到了夏天，往往直到天亮都不断人。”还有地域间的穿梭，从上海到香港。

造成“沉香屑”被困“炉”中的客观原因有五：

1. 封建传统的理学教导——古董式家庭教育

薇龙生在败落的上海旧式大家庭，接受的是中国的传统家庭教育。薇龙从小受到的来自父亲的正面教导是：不能败坏门风。这是中国传统理学对女人的“贞节”教育。如果不“听话”就是下贱，结果就是给气受。所以，发生乔琪事件后薇龙不敢再回到父亲身边做个“新的人”了。薇龙开始思考：受传统理念支配的“正义”的父亲无法维系避乱时家庭的支出，而父亲极力反对的反面教材姑妈，却在乱世中“滋润”地支配自己和周围人的生活。这个残酷的现实迫使一个辨别能力不成熟的十几岁的女中学生对“姑妈式”生活进行了“冷静”的思考，对父亲教育的反思。从而为薇龙选择自己的“出路”创造了心理基础。

2. 南英中学的殖民地西化教导——奴媚式学校教育

中国传统教育目标是把被教育者培养成封建伦理和封建制度所要求的“人才”。而殖民地的教育是为殖民文化服务的，对于宗主国，殖民地不过是他们攫取财富的源泉，这里的人在生活方式上要崇拜模仿他们的宗主国，在思想文化上要谄媚讨好他们的宗主国。只有对原有思想文化体系进行精神摧毁，才能打击固有传统对宗主国思想的抵制，才能实现有效的殖民统治。所以，薇龙的学校南英中学本不是培养什么精英人才，尤其是女学生，而是为了取悦游客。就连学校开设英文或法文课，也是为殖民地的长远打算，为了与宗主国交流，是殖民地奴性的标志。除了生活方式教育，还有宗教教育，比如薇龙参加唱诗班的活动。梁太太举行家庭游园会，邀请薇龙唱诗班的伙伴，同时邀请了天主教的修女。这些都是学校教育的导向。所以香港的学校教育和上海的传统教育在育人标准上是有分歧的。上海教育是封建士大夫基础上的“新学”，而香港教育则是为殖民统治服务的。这样矛盾的两个体系混乱了薇龙的是非评判标准，是薇龙行为堕落行为的前期心理铺垫。

3. 梁太太的家庭环境和生活理念影响——交际花技能培训学校

姑妈用自己多年青春换来的物质驾驭了贫困中的薇龙。她按照预先设计好的步骤首先对薇龙进行精神征服：欲擒故纵，先骂薇龙的父亲，使薇龙在自卑中失去

判断力；再利用奢华的生活方式诱惑薇龙，进行交际技能培训（钢琴、网球、家庭聚会），用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娱乐活动引诱薇龙。在量网球服尺寸的同时也就量走了薇龙的身材数据，为薇龙准备了满橱的衣服，使贫困中的薇龙沉浸在衣橱中。理学虚弱的理论在强大的物欲面前退缩了：薇龙一边用父亲的理论抗拒姑妈的诱惑，一边在姑妈的麻醉下享受物质的快乐。

当薇龙和乔琪的“婚事”被姑妈设计撺掇成之后，“薇龙这个人就等于卖给了梁太太和乔琪，整天忙着，

不是替梁太太弄钱，就是替梁太太弄人。”这就是被桎

梏在“香炉”中“香”的命运！这是姑妈这只“蜘蛛”在盯眼看过薇龙之后，就设计好的一张网：那毒寡妇黑蜘蛛，不仅吞噬来寻觅她的“雄蜘蛛”，也不放过任何一只在蛛网旁飞过的蚊蚋。薇龙成为姑妈的猎物，成为那个集中国传统封建文化和奴性殖民地文化糟粕于一身的香港这个“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中的一炉沉香屑。姑妈的家庭环境是薇龙堕落的陷阱，是那个历史久远的古董铜香炉的象征，薇龙无奈地、清醒地在炉中燃烧了自己青春的生命。

4. 浪子乔琪的干扰与迫害——扭曲的“情爱”观念

乔琪是众所周知的浪子，他周围所有女人都知道不能嫁给他，但都喜欢被他关注，与他游戏。他的魅力就在于长得“洋气”“帅气”，他不爱薇龙，只是戏耍她。薇龙知道他是唯一能抗拒姑妈诱惑的男人而爱上他。乔琪的爱情观、婚姻观是薇龙堕落的直接原因。

5. 香港大环境的浸染——合围的铜香炉

纸醉金迷、物欲横流的殖民地生活，今朝有酒今朝醉、及时行乐的交际场风气，尔虞我诈、利益至上、拜金主义的商业社会，这一切是一个十几岁的是非观念未定型的女孩子陷落其中不能自拔的社会原因。

可见，张爱玲是在用一种悲悯的情怀怀念一个青春的灵魂，那个美好的灵魂就像是一炉沉香屑，名贵、高雅，却被围困在那个古董一般的环境里，任凭缓慢的微火燃烧，却不给足够的氧气，慢慢地被消耗掉。这就是本文对《沉香屑·第一炉香》题目意义的阐释。

十六.《沉香屑·第一炉香》的苍凉之感

张爱玲，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个性特异的女作家。《沉香屑·第一炉香》是她发表的第一部短篇小说。这篇小说今天读来犹觉历久弥新，魅力不减，究其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在她的作品中建构了一个独特的世界，同时在这个世界中透出的缕缕苍凉之意更让人回味、深省，其中，这“苍凉”之意的完成，正是靠着作者对于语言的独特运用得以实现的，可以说，张爱玲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是惊人的。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主人公葛薇龙本是一个纯情而又有个性的女学生，因家境没落，为了能继续求学而来到名声不好的豪门遗孀姑妈梁太太家求助，然而，她在姑妈家并没有得到人世间应有的亲情、关爱，反而在亲情与爱情的消解中得到的却是由被动到主动的沉沦。这种人生的悲剧与苍凉在小说的景物描写中就已渗透出来。小说开篇就通过对比的写法描绘主人公葛薇龙初到姑妈家时看到的房屋的情形：“……山腰里这座白房子……类似最摩登的电影院。然而屋顶上却盖了一层仿古的碧色琉璃瓦……里面是立体的西式布置，但是也有几件雅俗共赏的中国摆设，……但是，这里的中国，是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荒诞，精巧，滑稽。”这是小说中人物生活的环境，也是一切故事发生的地点，作者正是通过对这房屋的中西建筑风格杂糅的对比描写，含蓄而又巧妙地讽喻了四十年代香港殖民文化的不伦不类，并且极生动地刻画出特定时代背景下香港小市民畸形荒诞的心理特征。这也为葛薇龙将要生活的环境进行了特定而又清晰的诠释。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葛薇龙——一个鲜活的生命，逐渐被拖向黑暗，坠入深渊。她的不幸，不仅归罪于她生活的环境，而且与姑妈对她进行的奢靡生活的诱惑不无相关。姑妈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欲和利益，利用她作诱饵来吸引有钱有势的人。这从姑妈为她准备的奢华服饰上就足以见出。当她走进姑妈为她准备的房间，看到衣柜里姑妈为她准备的琳琅满目的衣服时，其实她的悲剧已经拉开了序幕。作者通过对汇集在衣柜里的中西方服饰的对比描写，表面上看好像是写出了姑妈对她的关爱，其实背后暗藏着姑妈的别有用心。同时，通过这样的对比描写，也将当时被殖民侵入、统治的社会现实描绘了出来。其实，当一个民族被征服，不仅仅表现在武力上的征服，同时文化上的征服更让人感到岌岌可危。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有时，看似一种简单的景物或事物描写，实际上却蕴含着作者深刻的人生感悟和心理历程，甚至通过这种感悟和心理变化，人们可以一下子抓到人物的本质。张爱玲正是通过这样对比的描写，将“人性恶”揭露了出来。她站在苍凉的基石上剥去繁华的生活外衣，使人性深处的卑琐、自私、虚伪、扭曲揭示了出来。

不仅如此,《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色彩词语的运用也是独具特色的。作者自己曾直言不讳地说:“对于色彩、音符字眼,我极为敏感……我学写文章,爱用色彩浓厚,音韵铿锵的字眼。”并且,她的色彩词语,不只是单纯地停留在对事物的描摹上,更重要的是折射出色彩之外的情绪与感悟。按常理,五彩缤纷的色彩本应给人以美感,但在作者笔下,往往将一些不搭调的色彩调配在一起,让人感到具有强烈的刺激性,刺痛人们的眼球。正像她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写到,葛薇龙只身一人来到姑妈家却被姑妈奚落一番后,她看到的屋子里的摆设却是:“一抬眼望见钢琴上面,宝蓝瓷盘里一颗仙人掌,正是含苞欲放,那苍绿的叶子,四下里探着头,像一窠青蛇,那枝头的一捻红,像吐出的蛇信子。”这里“宝蓝、苍绿、青红”的色彩本是鲜艳夺目的,但将它们杂糅在一起,令人毛骨悚然,此时,它们已经变成了一团会说话、会表演、令人恐怖的怪物,暗示着葛薇龙在姑妈家中的不愉快心境,也说明姑妈家潜伏着腾腾杀机,直刺她的身躯,即将吞噬她的灵魂和身体。作者就是这样通过色彩词语的巧妙运用,在作品中将掩映在色彩中的“苍凉、凄婉”突兀而生动地表现了出来。

葛薇龙的命运既有其苍凉,更有其悲哀。她的悲哀,不仅在于亲情、爱情的缺失,还在于她自己对物欲、情欲的痴迷。刚开始,受过新式教育的葛薇龙无论在情感上、理智上还是道德上都以姑妈的方式为耻,在姑妈的物欲面前,她曾经清醒过,抵抗过;对乔琪的感情也曾理智过,挣扎过,但虚荣心又让她对姑妈的奢华羡慕不已,少女的情感又使她经不住异性的吸引,可以说,她对于那个充满危机的社会,一边是本能地惊慌逃避,可另一边又是在物欲、情欲的倾轧中沉沦。因此,葛薇龙的命运必将是悲哀的结局,就像是暗淡下来的天色,虽然“月亮才上来”,但却“像玉色缎子上刺绣时弹落了一点香灰,烧糊了一片”,她的灵魂已被腐蚀得黄中带黑。张爱玲就是这样运用色彩词语,揭示了人与环境、人、自我的冲突中的脆弱和无力,这悲剧的结局,不仅透出了苍凉,更透出了悲哀,表现了作者对于陷于尘世泥潭的人生的思索。

总之,穿越历史的隧道,张爱玲作品的“止乎苍凉”的华美仍散发着挥之不去的余味。她独特的生活环境和生活经历,成就了她独特的语言风格。她语言中的那份苍凉、凄婉无不感染着每一个读者,使读者从中看到更多、想到更多、感受到更多,总有一种品不完的常新感觉。

十七. 意象分析

(一) 风雨意象

“风雨”作为自然物象,在小说中已经融合了作家对生命的体验,它联系着张爱玲经验世界中对生存的感悟。她曾在《我看苏青》一文中诉说过自己的一个“梦”及对这个梦的感受,这个梦是她不幸的童年经验的变形再现,也显示了她意识深层的悲剧性情结。她梦见自己在风雨中:“我做了个梦……而且下大雨……只得在黑漆漆的门洞子里过夜……风向一变,冷雨大点大点扫进来……”梦中风雨中的情景典型地再现了张爱玲“家庭失落者”的生存处境,在风雨飘摇的世界里,孤立无助,飘泊无依,胆怯可怜,自卑脆弱。这个情景虽然未必有生活实际作为依据,但它以“梦”的方式出现,是潜意识的自然表露,因而在内心情感的体验上,它有更深刻的真实性。“风雨”成为人物的生存之境,成为张爱玲将自己的人生经验外化到小说人物身上的意象。

张爱玲小说中的许多故事都发生在风雨之中,“风雨”成为她的小说中的一个基本意象。

葛薇龙(《沉香屑——第一炉香》)推脱不掉司徒协的手镯,此时小车外面正下着倾盆大雨,之后她终于在风雨之中一步步走向堕落。

(二) 服饰意象

服饰,可以被看作是自我身体的一种扩展。在女性主义者的观点中,“服饰”是和觉醒了的女性相关的重要因素。某种意义上,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必然会以装饰或材料的形式附着在服饰上,而其同时也拥有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质疑与颠覆的力量。《沉香屑》中的葛薇龙却是被服饰诱惑的一个可悲的牺牲者。张爱玲对东西方文化人文精神的深切领悟,赋予了这篇文章独特的服饰象征性。

在这篇小说中,服饰代表着纸醉金迷的诱惑。薇龙在这个世界中,将个人的自我意识逐渐的丢失了:她曾经希望凭借自己的力量改变命运,然而却错走了一步路,去到姑妈家试图讨要生活费和学费。本是为了好好读书,完成在香港的学业的她迅速由“个人奋斗”变成了“沉沦堕落”。

当她在姑妈家初安顿下来,打开属于自己的衣柜时:“家常的织锦袍子,纱的,绸的,软缎的,短外套,长外套,海滩上用的披风,睡衣,浴衣,夜礼服,喝鸡尾酒的下午服,在家见客穿的半正式的晚餐服,色色俱全。”这些华丽而齐全的服饰像一双双物质的手,将薇龙拉向了深渊。它们是薇龙“个人奋斗”梦想的对立面,象征着她一步步得出卖了身体,纯洁和青春。随着越来越多的服饰属于她,她的生活也逐渐向奢靡淫逸的方向发展,也象征着她最终向姑妈屈服,把自己的身体和灵魂都交到这个“女魔鬼”的手中。

(三) 仙人掌-蛇意象

以葛薇龙视角所叙述的梁太太豪宅内植物,“宝蓝瓷盘里一颗仙人掌,正是含苞欲放,那苍绿的厚叶子,四下里躺着头,像一窠青蛇,那枝头的一捻红,便像吐出的蛇信子。”“蛇信子”是危险的象征,它预示着这座美丽的豪宅极具危险性,一旦踏入,便会陷入无法自拔的境地。而促成这一切是其姑妈梁太太,因贪求物质享受嫁给了富商做姨太太。年老色衰后在香港站稳了脚跟,在自己的宅院里关起门做慈禧太后,收割着年轻人的爱欲,她需要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孩为自己笼络上流社会的交际关系,葛薇龙自然就成了她操纵的傀儡。单纯的女孩却认为自己有能力跳出这个被鬼气所笼罩的世界,殊不知罪恶的魔爪早已盘踞在四周。

(四) 金刚钻手镯-手铐意象

司徒协给梁太太送了一只金刚钻手镯,趁薇龙不注意,把一只一模一样的镯子也拷在她手上。这只金刚钻手镯象征了姑妈对薇龙的控制,以及薇龙陷入物质的泥潭。面对物质的诱惑,葛薇龙内心的自我迅速做出反应,“她急了,便使劲去抹那镯子,想把它硬褪下来”。这一幕也是别有深意,手镯如镣铐一般,戴上镣铐就代表她要就此被永远拘禁在那肮脏复杂的世界当中,任由那个荒谬的世界在一点点地将她腐蚀。少女心中最后的防线在抵御着这个黑暗世界的侵蚀,在这一场与本我物欲的搏斗之中,自我以极其微弱的优势压制了本我。在面对物质诱惑时,葛薇龙潜意识心理所表现出的抗拒与挣扎是自我机制抵御本我的结果。

(五) 黑夜意象-寒冷、黑暗

“火光一亮,在那凛冽的寒夜里,他的嘴上仿佛开了一朵橙红色的花,花立时谢了,又

是寒冷与黑暗……” 这里的寒冷与黑暗象征了薇龙此后人生的黑暗和悲剧。葛薇龙以自身献礼，在别人不值得的罪孽上，撞破头也成不了桃花扇，只是沾上了时代的旧袍上两点腥腻的血沫子而已。在沉香的缕缕细烟中，葛薇龙的故事落下了帷幕。橙色的花包裹着葛薇龙的全部幻想，她以为自己抓住了幸福，不过是醉生梦死一场，最终走向寒冷与黑暗。如果这场悲剧与沉沦有关，那么这是一场太过清醒的沉沦。

（六）蜘蛛意象

《金锁记》中的“蝴蝶标本”与《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蜘蛛作为两个实体性意象，“与故事整体构成相似性的关系，统领甚至可以之命名这个故事”。而梁太太呢，她在小说中的惊艳出场便是躲在面网之下，“黑草帽沿上垂下绿色的面网，面网上扣着一个指甲大小的绿宝石蜘蛛，在日光中闪闪烁烁，暗的时候便像一粒青痣”。蜘蛛结网捕捉猎物，而梁宅里的年轻女子就是梁太太结成的网。金钱买不到青春常在，但她可以“买进一个讨人”，利用这些年轻的鱼饵吊那些能给予她满足的男子。她从睇睇手里抢来乔成爵士，从薇龙的美梦里劫走卢兆麟。“不至于短不了我哇！打替工的早来了。这回子称了心了，自己的骨血，一家子亲亲热热的过活罢，肥水不落外人田。”这是睇睇对梁太太的无情揭露，更是对蜘蛛结网捕食的生动描述。

（七）红花意象

“整个的世界像一张灰色的耶诞卡片，一切都影影绰绰的，真正存在的只有一朵朵顶大的象牙红，简单、原始的、碗口大、桶口大。” 葛薇龙已经陷入了泥潭，这段比喻就像一个“血盆大口”，象牙红花是她内心欲望的外化，贪婪地不断扩散、深不见底，侵蚀着薇龙。

（八）月亮意象

“南方的日落是快的，黄昏只是一刹那。这边太阳还没有下去，那边，在山路的尽头，烟树迷离，青溶溶的，早有一撇月影儿。薇龙向东走，越走，那月亮越白，越晶亮，仿佛是一头肥胸脯的白凤凰，栖在路的转弯处，在树桠叉里做了窠。越走越觉得月亮就在前头树深处，走到了，月亮便没有了。薇龙站住了歇了一会儿脚，倒有点惘然。”

这时她和姑妈谈妥，姑妈同意赞助她读书，她以为自己只要行得端走得正，就会找到喜欢他的男人结婚。她朝着月亮走，对月亮仍抱有幻想，但是走到头，月亮却消失了，预示着最后她所渴望的终究是梦一场。

“薇龙这样躺着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辰，忽然坐起身来，趿上了拖鞋，披上了晨衣，走到小阳台上来。虽然月亮已经落下去了，她的人已经在月光里浸了个透，淹得遍体通明。”

这里是乔琪与她夜会赏月离开之后，她在揣度乔琪与她的关系。月光是什么？是她所谓的爱情，月亮已经落下去了，她却以为自己想通了，她陷入了一厢情愿的、如梦如幻的故事里。

（九）沉香屑

“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听我说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您这一炉沉香屑点完了，我的故事也该完了。” 故事的开头，就是一炉沉香屑，象征着陈旧的，过去的，旖旎的，却又告诉我们：沉香屑是短暂的，我们的故事也是短暂的。